

银行管理理论与实务

**——中国银行业管理案例
启示及观念转变**

冯彦明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六章 创新观念：一部银行发展史 就是银行创新史

引言 经典与案例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读解：商汤的《盘铭》说：“如果一日能够创新，则日日都能创新，这样，每日都能创新了。”《康诰》说：“做每日都能创新的人民。”《诗经》说：“周朝虽然是个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无处不追求完善。

花旗银行在日本的成功

花旗银行在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融资部门。它和数百家日本的贸易公司、制造商、保险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这个商业化的融资机构首次在东京对客户推出 24 小时全天服务，营业额达 10 亿美元。花旗银行也是首批推出日元利率互换的银行之一，这也为在东京建立外汇交易市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此

外，花旗银行在货币期权交易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花旗银行根据对客户提供的服务类别以及应用非传统还是传统的业务服务方式来对其新创设的金融业务进行划分。在进行传统业务的过程中，花旗银行总是辅以其特有的专门技术和其他分支的成功经验，以确保其新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花旗银行的复合货币账户——简称“复合货币”——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一业务原为花旗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所创，经过其日本机构修改后，适应了当地的需求。这种复合货币账户不但使客户在六种自由货币中随意选择进行存款，还可以代为客户保管黄金。此外，花旗银行在日本还推出其他一些创新、金融业务和服务，包括信函和电话通知账户、使用客户的本国语言为客户提供服务，以及根据客户多币种账户存款的收支情况自动调整授信额度等。近几年来，花旗银行又在日本市场推出了被称为“一揽子”的业务和一种叫做“高度安全”的业务，作为一种可以避免损失的担保存款业务。它除能确保客户原有的日元资金不因汇率变动而损失外，还可使客户的资金在运动中实现最大的价值。1990年，花旗银行又在当地进一步拓展其日元和外币存款业务，尽可能增加存款者的收入。花旗银行在日本的金融创新是没有局限性的，位于东京奥地麦齐的花旗银行弗莱格奇波分行有一个自动出纳系统，可随客户用英语、日语两种语言办理支付现钞、转账和接受存款等项业务，闭路电视显示屏遍布于分行的各个角落，随时向客户提供利率、汇率以及有关银行业务与服务方面的信息。花旗银行在日本业务的30%是通过电话办理的。经过一年的调查，银行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客户愿意用打电话的方式代替直接到银行办理业务，于是开办了电话办理业务，并广泛地宣传客户可以免费使用长途电话来办理业务，这项业务吸引了大量的客户。同时，通过电话和信函手段办理业务使一年中到银行办理业务的人数减少了30%。客户愿意与超越传统营业方式的银行进行业务

往来的愿望为花旗银行带来了不少益处。首先，它利于花旗银行在整个日本市场推广其业务，寻觅新客户，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在东京地区设立机构，拓展业务。其次，它使花旗银行以比传统银行网络更低廉的运营费用来吸引和服务于客户。另外，花旗银行成功地将它应用于世界各地的信用卡业务的处理方式加以修改，介绍到日本以满足当地的需要，花旗银行因引入此项业务而迅速占有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在这一过程中，花旗银行充分利用了它所持有的现存和潜存客户的内部资料，并通过信函与这些客户建立联系，吸引新客户。花旗银行通过信函方式拓展业务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所占有的这些资料，这具被称为西蒂贝丝的资料管理系统，掌握着那些潜在的客户的姓名、地址以及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家庭资料被纳入这一信息系统。由于这些资料的内容总是不断地根据客户对银行业务推广信函的最新反应加以修正，因而银行可以按照客户对某项业务的关切程度来建立他们的档案资料。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客户信息并降低运营费用。花旗银行深入的市场调查也是其在日本业务不断拓展的关键。在他们进行的调查中，一些注意了解客户对开立账户手续的满意程度，另一些则试图了解为何有些客户停止使用他们的账户或仅仅保持低水平的收支业务。花旗银行还建立了所谓服务的“监视系统”，这一系统既有助于更有效地实施内部管理，也可以确保提供更好的服务使客户满意。目前，总共有 50 多个这样的“监视系统”在进行工作，监视的项目包括诸如客户排队等待办理业务的时间长短，客户使用银行各种线路打入电话是否遇到麻烦，以及客户对银行提供账户说明是否及时地反映等。

第一节 一部银行发展史就是记述 银行如何创新的历史

创新，一个令人神往而又颇使人困惑的字眼。个人需要创新，国家需要创新，银行也需要创新。其实，一部银行发展史就是记述银行如何创新的历史。

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商业银行也不例外。现代商业银行，自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直到今天商业银行在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也不能否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银行家们也在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和条件，不断总结和创新。商业银行逐渐更新的经营理论就是这种创新的真实写照。一部商业银行的发展史就是记述商业银行如何创新的历史。因此，我们这里重温西方商业银行的理论演变和创新史，对于我国银行业未来的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资产管理理论

在商业银行产生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点放在资产业务方面，因此产生了资产管理理论。资产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负债是资产的既成前提，银行只能对资产主动加以管理，努力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来实现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资产管理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商业性贷款理论

这是商业银行产生初期所形成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从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进来的活期存款这一客观现实出发，认为商业银行只应发放短期的、与商品周转相联系或与生产物资储备

相适应的自偿性贷款，也就是发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因为这类贷款能随着商品周转、产销过程的完成，从销售收入中得到偿还。这种理论认为，商业银行不宜发放长期贷款和消费者贷款，即使需要发放，其数额也应严格限制在银行自由资本和储蓄存款的范围之内。同时，这种理论强调，办理短期贷款一定要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基础，要用真实商业票据作抵押。这样，在企业不能还款时，可以处理抵押品，保证资金安全。

商业性贷款理论是适应商业银行发展初期银行内外部条件和环境所产生的。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程度很低，一般企业的营运资金多数来自于自有资本，只有在出现季节性、临时性资金不足时才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当时人们还没有举债消费的习惯，发放消费者贷款未必会有市场。因此，从当时商业银行所处的背景来看，主要资金运用方式只能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从银行自身的条件来看，当时的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不多，资金来源的高流动性要求资金运用的高流动性。在当时的银行资产中主要是现金、贷款和固定资产。现金是保持流动性的主要手段，但现金是非盈利资产，保持大量现金很不合算，这就要求银行其他资金运用方式——贷款保持一定流动性，即发放短期自偿性贷款。这样既可减少不必要的现金准备，增加盈利资产的数量，又可保证银行的流动性，以保证银行的正常经营。

商业性贷款理论的产生，对银行信贷经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它为保证银行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找到了依据和方法，从而避免或减少了由于流动性不足或安全性不够带来的风险。有了这种理论，人们不至于无所适从，盲目投放资金。其次，适应商品交易对银行信贷的需要。由于这种理论强调以真实商品交易作基础，因而银行信贷能随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或缩减而进行自动调节，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因为如此，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各国商业银行都遵循这一理论。

但这一理论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没有考虑到贷款需求的多样化。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企业对长期借入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举债消费的观念。消费贷款需求不断增加。如果固守这一理论，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就会受到限制，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同时在竞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其他专业性金融机构如投资公司等，形成了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巨大压力。

第二，没有认识到存款的相对稳定性。尽管活期存款随存随取，但一般总会形成一个稳定余额，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这个稳定余额会不断增加。根据这个稳定余额发放一部分长期贷款一般不会影响银行的流动性。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比重上升，稳定性增强，银行资金的可用程度越来越大。这一理论的弊端也就越来越突出。

第三，没有注意到贷款清偿的外部条件。尽管短期贷款流动性较高，而且有商品物资做保证，但贷款能否自动清偿的关键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企业生产的正常周转，在于商品能否及时销售出去，如果某企业商品销售遇到困难或发生危机，贷款期限再短也未必能按期自动清偿。

（二）转移理论

这一理论是随着西方短期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出现的。以前，西方国家不存在短期证券市场，银行只能依靠现金和贷款来保持流动性。1929年以后，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短期国库券，为银行提供了新的流动性资产，同时，由于30年代大危机的影响，削弱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致使商业银行将一部分资产投资于短期证券，作为保持流动性的二级准备。为此，转移理论就应

运而生。

转移理论认为，银行能否保持其资产的流动性，关键在于资产的变现能力。只要银行所掌握的证券具有信誉好、期限短、易于出售等条件，在需要资金时，可以迅速地、不受损失地出售或转让出去，银行就能保持流动性。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由于有政府担保，期限较短，利息较高，因此变现能力强，作为银行的流动性资产比较恰当。

转移理论相对于商业性贷款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它使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范围扩大了，银行除了可以经营短期性放款业务外，还可以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并腾出一部分资金用于长期贷款，既不影响流动性，又增加了银行收益。因此，转移理论得到了广泛的推行。

不过，转移理论也存在着缺陷。关键问题是，银行资产能否变现，证券转移能否实现，要取决于银行之外的市场，即第三者的购买。如果证券市场需求不旺，转移就会遇到困难，资产流动性也无法保证。

（三）预期收入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带来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不仅短期贷款的需求有增无减，而且产生了大量的设备和投资贷款需求。同时，随着生产过剩矛盾的突出，在凯恩斯理论影响下，人们开始注意给消费者提供资助，消费者也逐渐接受了举债消费的观念。在货币金融领域，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跟，求得发展，商业银行也迫切需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普罗克诺（H. V. Prochnow）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

预期收入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资产选择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无论是短期商业性贷款，还是可转让的资产，都不可能自动清偿。其贷款偿还或证券变现都是以对方未来收入为基础的。也

就是说，贷款和证券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取决于借款者的预期收入。如果一项贷款的未来收入有保证，即使期限较长，银行仍然可以接受。反之，如果一项贷款的预期收入不可靠，即使期限较短，银行也不能发放。根据这种理论，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发放短期商业性贷款，而且可以发放中长期设备贷款，还可以发放非生产性的消费者贷款。只要借款人的预期收入可靠，还款来源有保证就行。

预期收入理论深化了对贷款清偿的认识，明确提出贷款清偿来源于借款人的预期收入，这是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同时促进了贷款形式多样化，商业银行从此开始发放以贷款后的投资项目收入分期偿还的中长期设备贷款和分期付款的住宅抵押贷款，并开始办理设备租赁等业务。这就增强了商业银行对经济的渗透能力，巩固了商业银行的地位。

当然，预期收入理论也存在着缺陷。最大的问题是预期收入难以把握。如果借款人的未来收入能准确计算出来，银行贷款的风险当然会大大降低。但迄今为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的方法外，还没有人提出其他办法能计算这种收入。因此，过去按照这种办法经营银行贷款，客观上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

二、负债管理理论

负债管理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发展到了极盛时期。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把保证银行流动性的经营重点由资产方转向负债方。过去，人们考虑商业银行流动性时，注意力都放在资产方，即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将一种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转换成另一种流动性较高的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则认为，银行的流动性不仅可以通过加强资产管理获得，而且可以由负债管理提供。简言之，向外借钱也可提供流动性。只要银行的借款市场广大，它的流动性就有一定保证，没有必要在资产方保持大量高流动性资产，而应将它们投入高盈利的贷款和投资中。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理论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追求高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是负债管理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银行对利润的追求，使盈利性与流动性的矛盾更为突出，商业银行越来越希望能够在不牺牲盈利的前提下满足流动性的需要。

2. 生产的发展，资金需求的上升，迫切要求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加上通货膨胀的加剧，使负债经营有利可图。

3.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以后，西方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对商业银行实施利率管制，即禁止对活期存款付息，并规定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付息的最高限。到 60 年代，货币市场利率不断上升，一些企业在银行存款感到不合算，纷纷提取存款用于购买商业票据和其他短期证券。这使银行可贷资金更加短缺。为此，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向外借款，对负债管理倍加重视。

负债管理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它找到了保持银行流动性的新方法，将流动性管理重点移到了负债业务上；其次，为扩大银行规模、增加信贷投放创造了条件。负债管理一反传统的稳健保守的作风，强调主动进取，不断创新，被称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一场革命”。但其缺陷也很明显，按照这种理论来经营银行，不仅会提高银行的负债成本，而且使银行自有资本比重越来越小，“借短放长”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增加银行经营的风险。

三、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理论

不论是资产管理理论，还是负债管理理论，在保持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方面，都带有一定的偏向。资产管理理论过于偏重安全与流动，往往以牺牲盈利为代价，不利于鼓励银行家进取经营；负债管理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解决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矛盾，但向外借款的成功要取决于外部条件，因此风险较大，安全性不能保证。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产生了

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单靠资产管理，或单靠负债管理，都难以达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只有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通过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共同调整，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管理，才能实现三者的统一。

由于这种理论注意资产和负债管理的结合，全面注重资产与负债对银行资金周转和盈利的影响，因此成为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重大发展，被银行称之为科学的管理方法，为各国商业银行所共识，并得到银行广泛的应用。

四、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西方国家，由于放松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银行业的竞争空前激烈，同时，货币政策局势偏紧，通货膨胀率下降，又抑制了银行利率的提高和经营规模的扩大，银行存、贷款的利差收益愈来愈小。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非金融工商企业开始大规模介入金融业的竞争，使银行的处境雪上加霜，迫使银行寻找新的管理思想。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西方国家的银行家们又重温六七十年代曾经出现的超货币供给理论，提出了一种所谓的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存、贷款业务只是银行经营的一条主轴，在其旁侧，可以延伸发展出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因此提倡从正统的银行业务以外的范围去寻找新的经营领域，开辟新的盈利源泉。以信息处理为核心的服务成为银行在资产负债以外发展业务的广阔领域。

第二节 创新的条件和方法

一、创新的条件是有具有创造性的人才

前面我们说明，一切问题都是由人引起、由人解决的。创新

当然也不例外。世间最宝贵的是人才。历史前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无不折射着各个时代、各种门类人才创造智慧的光芒。

人类进入 21 世纪，这是历史的转折点。放眼世界，一个以数码、网络技术为先手，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正滚滚而来。可以说，一场社会经济形态更新的无声革命正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有识之士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说到底人才、科技的竞争。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财富，谁就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经济全球化时代呼唤着多类型、多层次、多规格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培育、造就这些人才，是兴国运、壮国威、福万民、泽后代之根本。

创新就是生命。江泽民同志说得好：“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经济全球化时代呼唤的人才，首要的是创新型人才。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型人才，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激情，富于怀疑性、批评性的追根究底的求索精神，而又有着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能在经济、科研、军事、文化等领域不断有新发明、新发现、新创意、新开拓。他们决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以仿效、复制为满足，而是充满探索欲、求知欲、进取欲，敢于独立思考，勇向权威挑战，有着永不停息的求新求变勇气和锲而不舍、不畏艰险的意志和毅力。回溯科学史，没有对托勒密宇宙体系的背叛，哪来伟大的哥白尼革命？没有对亚里士多德物理理论的怀疑，又哪来伽利略在运动学上的重大变革？没有对牛顿经典力学的超越，又怎么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呼唤着今天的哥白尼、伽利略和爱因斯坦，他们是经济全球化激烈竞争中最具创意和活力的精锐人才。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综合化、整体化及人文科学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加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

对人才的多样性、适应性需求日益增强，人们要求创新型人才应是多功能人才。他们不仅一专一能，而且多专多能，具有多才多艺的特点。仅以当前迅猛兴起的信息网络而言，它就熔铸了计算机、微电子、光电传输、卫星技术、自动化、半导体、多媒体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尤其是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集科技、文学、经贸、外语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早在十多年前，日本就提出“四合一”人才计划，要求培养有“科技内涵、艺术气质、经贸干才、外语本领”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类社会活动全球化的需要。因为，要适应多国经济和文化的工作生活环境，既要懂经济，又要懂科技、文化，还要懂几国语言，这才能“打起背包走天下”，在世界经济生活中自由自在、自如自得地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日本又推出一份探讨在新世纪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报告——《日本21世纪的新目标》。报告强调日本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竞争形势，需要进行一场与明治维新相比美的变革，其中规定要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在全国普及英语教育，并认为舍此日本人不可能很好地掌握数码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而也就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难以稳操胜券。这是一份顺应时代潮流的有远见有魄力的报告。

经济全球化时代，是合作取胜、协作竞争的时代。既充满激烈竞争，又急需协调和戮力。所以，适应全球化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又必定是协作型人才。这种人才不能乖僻古怪、恃才傲物、私心太重，而要善于协调，搞好人际关系，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团队拼搏的精神。他们善于在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经验、思想与实践、精神与效益、个人与社会等等关系之间，不断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圆融利害，防止内耗，戮力同心应对各种严峻的挑战。这才有可能赢得机遇，竭尽潜力，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二、创新的方法

创新，一个听起来多么神秘、复杂、令人困惑而又引人神往的字眼。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创造性、创新性、创新能力这种本来非常简单、人人具有的能力被人误解、歪曲，使人望而却步。表现在：一是一些人把创造性活动误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以此来吓唬普通老百姓；另一就是由于普遍存在的短视症，对创造性活动本身和过程并不加以重视，甚至有些人对“沉湎”于发明、创造的人随意讥讽、歧视，而对发明的成果则（总起来讲）任意吹捧、炫耀，这不仅使创造者如坠云里雾里，一会在地下，一会又在天上，摸不着头脑，不能很好地总结自己；而且也使其他人对发明创造充满了神秘感，只看到发明创造的成果，不能了解发明创造的过程。这与“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和做法如出一辙。

创造力决不是个别“天才”人物所独有的神秘之物，在任何一个正常人身上都有创造的禀赋与潜力。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随随便便就能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来。正如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所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这就是说，创造性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只不过这种规律并不是只有少数人能掌握和运用，而是所有正常人都能掌握和运用。只要我们发现、懂得并运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创造性禀赋与潜力，掌握创造的规律性，每个人都能做出不凡的业绩。

一般人研究创造力，多从一些熟悉而又抽象的名词概念入手，比如要求人们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活跃的思维能力，以及联想能力、记忆能力、想像能力等，还要求人们有兴趣、意志、动机、情绪等。确实，这些能力和条件都是一个现实的创造者所具备的，但一个潜在的创造者该如何具备这些能力和条件？这些能力和条件又从何而来？如何培养？迄今专门研究“创造性”问

题的人们并没有给出答案。显然，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创造性本身，就是创造性所需要的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如敏锐的观察力、记忆能力或兴趣、情绪等都会把人难住，比如有人会说，“我就是不善于观察，你能教会我怎么观察吗？”或者，“我每天都在观察，但就是发现不了新东西，你说怎么办？”“我的记忆能力在一天天下降，老是记不住东西，或者即使现在记住了，转眼就忘，你说怎么办？”（很多人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会越来越差，怎么解释？怎么办？）“你让我培养兴趣，我就是没兴趣，培养不起来，你说怎么办？”“我今天一点情绪都没有，什么也不想做，怎么办？”……

显然，一般人的研究都是在“归纳”、“总结”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归纳”、“总结”可能是（确实也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或必经阶段，但绝不是解决问题本身。不仅如此，归纳、总结如果不能与解决问题联系起来，这种归纳、总结就很可能出偏差甚至错误，轻者使人对创造性发生误会、误解，重者则会误导、扼杀人的创造性。比如我们平常所说的兴趣、情绪、动机等，这些并不是创造性本身所需要的，比如动机，一方面，没有动机不一定没有创造。历史上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偶然发现的，其中并不一定要有“故意”的成分。另一方面，是不是有了动机就能创造出东西来呢？如果有了动机会不会造成“为我所用”、“先入为主”的片面性、主观性呢？再如兴趣，没有兴趣可能没有创造，但兴趣本身是不是可以说就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换句话说，有有兴趣的，就会有没兴趣的，如果对一些事物有兴趣而同时对其他事物没有兴趣（这恐怕是普遍情况），这不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吗？会不会造成“钻牛角尖”的极端行为？这种行为又怎能有所创新？即使有什么“创新”又怎能普遍适用？再比如记忆力，就像经验一样，是把“双刃剑”，运用好了会有助于创造，用不好则会阻碍创造。

那怎么办？其实，古代圣人早已经为我们给出答案。

《大学》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大学教育的目标，在于让人所固有的纯正德性显现出来，在于使民众的品德不断进步，在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

这就是说，大学要达到三个目的：①让人们发现自己本来的、固有的、纯正的德性，并把它发扬光大，使人不至于左右摇摆，无所适从。这是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是每一个人的前进方向。②使人天天进步，日日自新。这既包括对自己德性的发现和认识，也包括对“已知”、“发现”运用于实践使之发扬光大，也就是身体力行。这是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③教会人们达到至善圆满境界的方法，这就是“止于至善”。这里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何谓“至善”？二是如何达到“至善”？“至善”就是第一方面所说的人的固有的、纯正的德性，也就是后文所说的“至诚”。至于说达到“至善”的方法，正是“止”，即“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就是心定一处——至善之处，不胡思乱想，不杞人忧天，不怨天尤人，不庸人自扰。“至善”就是“至诚”。曾国藩先生说：“一念不生即为诚”。所谓“一念不生”，就是不生邪念，没有杂念。如果有了邪念、杂念怎么办？止！止于何处？“止于至善”，也就是用“至善”的念头代替邪念、杂念。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文章紧接着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说，知道了所要达到的至善境界，然后才能确定努力的方向，确定了努力的方向，然后才能使心静下来，心静下来然后才能神思安稳，神思安稳然后才能认真考虑问题，考虑周全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在这里，要紧接着上一句话来理解，“知止而后能定”，首先要“知止”，即知道“停止”、“终止”，停止什么？终止什么？

就是停止、终止非“至善”之念，达到“一念不生”的境界。这时，不仅个人有了确定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是始终不渝，他不会朝令夕改，也不会见异思迁，这就是“能定”。只有有了这样的方向和目标，他的心才能平静下来。何谓“能静”？海面无大浪叫“小静”，水面无波纹叫静，树叶不动叫静。树叶随风飘摇叫不能静，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水面随风起波也叫不能静。只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才叫静，也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静”，就是要达到“忘我”的境界。而“忘我”、“无我”才是真正的“至善”。也只有这样，一个人的心才能安稳，才能泰然自若，才能冷静、客观。也就是才不会主观、片面。这也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照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去看生活”，去分析问题。心安稳才“能虑”，“能虑”首先是“会虑”。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思考问题，也可以说都经常在考虑问题。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或者说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说原因在于我们不会考虑，大家都会感到冤枉。其实，如果对照一下，才会发现我们真的是不会考虑问题。如果不信甚至反对，那么我问你：“你心安吗？”不安，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心安的时候。信不信？我们考虑问题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模式，其出发点是“先入为主”，是“希望怎样”，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们是常住茅坑久闻不知其臭。所以说我们心不能安，心不安也要考虑，也要思维，只不过这种考虑、这种思维不合规律，常常出偏，因此就是不会考虑。会考虑才能收获，不会考虑我们自然就不能得到预期的收获。这就不能怪我们没有创造力，没有收获。并不是我们没有创造力，而是我们不会创造。并不是我们不会创造，而是我们不会考虑、思考。也不是我们不会考虑、思考，而是我们心不安。

我们的这种讲法，历代历朝也都有善研究者，他们得出与古代圣人相同的结论，证明了圣人观点的正确性。别的不说，就拿

现时代来说，就不乏这样的人物和成果。我们没有能找到这样的金融创新的案例提供给大家，因为正像前面所说“历史记录”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创新的成果而不是创新的过程。但历史上也确实不乏这样的文章，记述了创新的环境和经历。我们在这里可真是“旁征博引”、利用“他山之石”侧击金融创新之“玉”了。让我们先看看“安静的力量”吧。

安静的力量

清晨，伴着“沙沙”的雨声醒来。

我蜷缩在床上，眼睛却眺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深褐色的秃树干。尽管屋里依然是冬天那一种暖暖的干燥的热气，但我可以预感，房间外边已是早春的湿湿润润的气息了。

迅速起床，推开阳台上的窗户。果然，一股湿淋淋的由土地呼出来的雨水的味道沁入干燥的肺腑，我感到所有沉睡一冬的小虫子肯定都会在这个雨雾蒙蒙的清晨睁开眼睛。

阳台上的龟背竹又长出了嫩绿的新芽。回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浑然一体的宁静的气息了，甚至，已经几年没有看见早春时节街道两旁满眼的树木是如何发芽抽叶的了。一直以来，城市的噪音、人群的纷争以及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的压力，使我对身边这些安宁的事物几乎视而不见。不知是这一场春雨，还是什么莫名的奇怪的引力，这会儿我终于重新看见了它们，一时间，竟恍若隔世，惊叹自己何以多时以来浑然不知？

其实，此时天地万物的和谐之感，首先是缘自我近日内心的安静。

这几天，我感到一股奇妙的安静的力量在内心里生长，它们先是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进而渐渐成形，然后它们成为一股清晰而强有力的存在——那是一团沉默的声音，它们一点一点地侵蚀、覆盖了我身体里的那些嘈杂，然后一直涌到我的唇边、涌到我指尖上来。我清晰地听到它们。这样，我的唇边和指尖都挂满

丰沛的语言。我无须说话，无须表达。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同我此刻一样恬静，你就会听到它们。

由于它们的存在，当我独自一人对着墙壁倚桌静坐的时候，我的眼前不再是一堵封闭的墙，相反，我的视野相当辽阔，仿佛面对的是一片丰富多彩的广袤景观，让人目不暇接，脑子里的线路与外部世界的信号繁忙地应接不断；而当我置身于众多的人群中，却又如同独处一室，仿佛四周空空荡荡什么都不复存在，来自身体内部的声音密集地布满我的双眼。

这感觉的确相当奇妙，但外人却难以察觉。它似乎是一种回家了的感觉，也似乎是复苏了的感觉。以前很多时候，人在外面，在茫茫人群里，嘴和脚走动着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心脏和血液几乎是死的。而此刻，尽管肢体一动不动但心脏和血液却都活了起来。

多么美好！

桌上的这一页白纸，几天前它就空洞地展开着，张着嘴等待我去填充，如同一个空虚的朋友，饥饿地等待着灌输。然而现在，我对它依然不置一词，可这张白纸却分明在我的眼睛里忽然涂满了字，充满内容。

电话机安静地卧着，像一只睡着的小动物。但是，它的线路却时时刻刻在我和我的对话者之间无声地接通着，我无须拿起话筒，交谈依然存在。

泰伊的《弥撒曲》远远地徐徐地飘来，其实我并没有打开音响，那声音在按钮潜藏在我的脑中，只需一想，那乐声便从我的脚尖升起。我甚至不是用耳朵倾听，而是用全身的皮肤倾听。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我一个人坐在沙发里，看着室内橙黄色的灯光与窗外正在变得浓稠的暮色，看着它们小心翼翼地约会在玻璃窗上，挤在那儿交头接耳。再仔细倾听，窗外的晚风似乎也在絮絮低语，间断掉落的树叶如同一个个逗号，切割着那些凌空

漫舞的句子。

.....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种时刻，所有的嘈杂纷争、抑郁怨忿，甚至心比天高的欲望，全都悄然退去了，宁静、富足，甚至幸福感便会从你的心里盈盈升起（《建材周刊》2003年3月17日）。

你看，这是多么神奇的发现，这是多么美妙的文字，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试想，如果没有内心的宁静，哪来得如此的感受？哪会有如此的“发现”？那会有如此的诗情画意？

让我们再看看有“现代管理学之父”美誉的松下幸之助在松下公司的训练之道吧。松下向传统致敬。

清晨5点45分，上田贤一郎已神情兴奋如同赛前的拳击手。21岁、身材瘦削的他一边跳跃着，一边大嗓门地吆喝，督促他的35名同学到室外去晨跑。他每日的生活直至晚10:30熄灯才能结束，就如同军事院校一样有规律。

上田并不是教官，这儿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新兵营。这些学生是在松下幸之助营销管理培训学院接受为期一年、旨在培养松下特许经营店主的培训学习。松下在日本拥有18000家连锁店，经营松下电器公司生产的从手提电脑到灯泡等产品的零售。学生们中有一半刚刚高中毕业，所有学生的家长都是店主。

作为执业预备学校，学院成立于1970年，距京都有20英里，是以受人尊敬的公司创始人命名的。创立之后，学校的课程变化不大。学生要培养坚韧、进取、合作三位一体的松下精神，学习电子、市场营销和信贷运用方面的课程。在寒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到校友办的公司打工。

在实践中，课程内容是进行一系列仪式化的训练。它强调日本传统的销售方式，认为付出的努力与效率是同等的重要。学生们天明即起，以二列纵队绕着附近的松下空调厂慢跑。一圈下来

是 1.9 英里，学生必须精确地用 13 分钟完成。一队学生中颂着“销售”，另一队回应着“追求”。监督人根据队伍的整齐和声音的大小来打分。冬天他们就带着手电筒。跑步之后，学生就在一个庭院里集合活动四肢，聆听教诲，唱校歌。借鉴海军一项古老的习惯，他们要向自己家乡的方向鞠躬。考虑到学生们就是未来的店主，教官们会严惩那些在腮胡、镜架方面出格的学生。（学生如果染了头发，马上就会被带到附近的理发店）现年 54 岁刚刚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原田良彦说：“学校的作用不仅仅是教授学生如何销售电器，还要教会他们做人的正确行为方式。”

所说的正确方式包括团队精神和忍耐。学生们住在 10 层楼梯的宿舍里，每天他们都要打扫宿舍。3 个女同学独住一楼层，与男生之间的楼梯以墙相隔。（学校不鼓励学生之间结婚，因为如果那样就会减少以后连锁店的数目）每个房间里有床、空调、桌子和告示板。图片和照片是不允许摆放的。如果学生违规，两周内则不许离开学校。

学生们被督促着练习声带。一有机会他们就大声喊叫“请”、“谢谢”和其他词组。每人随身携带一叠卡片，上面记着 10 个在店里最常用到的短语，每个短语边上还有一个数字，标明使用这个短语的同时应该鞠躬的角度是多少。说“很抱歉”时要鞠 70 度的躬，“请再次光临”要鞠 50 度的躬。来自横滨的中川一代说：“自来这儿后我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在这儿的静默沉思和训练，我变得更积极而沉稳。”

三洋、日立和三菱电器等都设有零售网络，但松下的网络分布最广也最注重为农村用户服务。原田是力倡传统方式的，他认为：“对于那些建立在友善与自立基础上并经过时间检验的文化应该有所保留，而不是不加考虑地完全推翻。”（《英语文摘》）

看到这种训练方式，就会想起中国古代的教学方式，二者如出一辙。本来，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摒弃了这种方式，因为我们认

为它过于单调、枯燥，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但实际上，这又成就了一例“墙内开花墙外香”，也许，中传一代的话可做注脚：“自来这儿后我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在这儿的静默沉思和训练，我变得更积极而沉稳。”

最后，有人替我们总结了，虽然这里的总结可能不够完善，不一定都符合我们的原意，我们还是首先放下“我见”学一学桑士达的观点：深思须善静。

近些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真正坐下来，静下心，“闲”中取静，开动脑筋，冷静思考。只有乐于守静，善于守静，才能多思、深思，从而思出成效。

一般地说，领导干部担负的任务较重，工作较忙，一天到晚“动”多“静”少，想静心思考和研究点问题，确实不易。领导干部因为“忙”而很少有时间坐办公室，这原本无可非议——只要忙得实在，忙得有价值、有意义。许多像焦裕禄、孔繁森式的领导干部，没日没夜、长年累月地为国为民奔波忙碌，这是公而忘私的“忙”，务实有效的“忙”。这种忙，虽然自己累一点，却于公有利、于民有益、于国有功，值得称赞和提倡。但也毋庸讳言，有些同志的“忙”，却让人不敢恭维。比如，有些领导干部经常“忙”得不亦乐乎，思得头昏脑涨，其实无非是出席接二连三的大会小会，加盟天南海北的学习考察，参加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赶赴一拨一拨的交际应酬，光临热闹非凡的开业庆典。这种忙虚多实少，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久而久之，容易使人陷于事务，沉溺享乐，思想懒惰，不愿思考问题。

诸葛亮有句名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位先贤特别强调“静”对于

提高修养的重要性，这是值得深思的。毫无疑问，领导干部应当心系人民，勤奋工作，创造一流的政绩，以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而言，如何在党和人民授权的职位上抓住关键忙出成效，是大有讲究的。经常深入各项工作领域的第一线，直接检查和指导工作；经常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吸纳民智，听取民意，以集思广益，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还要讲究“坐”功，即要安下身，静下心，善于运筹帷幄、深思细酌，善于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善于把握机遇、谋划发展，对关系本地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事宜，进行认真地研究、理性地思考。因为，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身先士卒不可少，但把握大局、思考问题、正确决策更重要。惟有凡事深思熟虑，三思而行，才能达到提高领导水平、决策质量和多出政绩实绩之效。

一些领导干部“静”不下来，是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从客观上讲，有些同志的“忙”确是身不由己。这就需要上级部门多为下级创造“静”的条件，如能不开的会就不开，能合并的会就合并开；一些活动能让其他同志参加的就不叫主要领导人出席；等等。从主观上讲，能否从“百忙”中解脱出来，还取决于自己。只有不忘重任在肩，善于着眼大局，抓好大事，才能做到闹中取静；只有善于弹好钢琴，区分轻重缓急，摒弃琐碎小事，才能做到忙而不乱、忙而有序。

世界上万事万物，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处事论事亦如此。讲“静”功，不是一味地排斥“动”功，有意义的“动”，应当多“动”。说“静”功，也并非提倡那种坐而不动、坐而论道的“闲坐”、“懒坐”、“空坐”，安于得过且过，碌碌无为。在世事纷扰、体制转轨的复杂时期，领导干部乐于守静、善于守静，静心细心地探索事物的客观规律，聚精会神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提高领

导工作的效率是大有裨益的（《人民日报》2000年7月6日）。

第三节 西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启示

一、广义金融创新和狭义金融创新

说到金融创新，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种划分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从时间概念来看，广义的金融创新就是指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提出的，一部银行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记述银行如何创新的历史。因此创新是贯穿于银行发展全过程的，银行无时不在创新。而狭义的金融创新仅仅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金融界出现的第一轮大规模的、内容丰富、涉及金融业各方面的创新和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轮创新。

从金融与银行的关系来看，广义的金融创新涉及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各个业务领域，而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银行领域。

从银行创新来看，广义的金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工具创新、业务创新等，而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指业务和工具的创新。

二、理论创新的启示

从第一节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理论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创新是实践的需要。正是现实经济生活和条件的变化给我们提出了挑战，创新才成为必然。因此，认真研究现实，研究现实的经济生活、经济环境，是一切创新的前提条件。

2. 虽然理论来源于现实，但理论、规律绝不是现实的简单描述或概括，而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

西。因此，理论高于现实，理论指导现实。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理论脱离实际、书本知识脱离实践生活。确实，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理论也需要不断演进。但这并不是说理论必须为现实服务，正像现实中存在着好大喜功、浮躁轻狂，表现在银行的存款上就是简单地用提回扣、赠礼品等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来拉存款，而银行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理论为提回扣、赠礼品等辩护。因此，不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实践的探索都需要在国家法律和社会的伦理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是实际会偏离理论。

3.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现实中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人忽视理论学习和理论创新，片面地强调技术、强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患有“短视症”的表现。应该认识到，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像无眼的苍蝇、脱轨的火车，迟早会出问题。

三、西方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及其启示

正像上面所说，一部商业银行的发展史就是记述商业银行不断创新的历史。而创新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表现在业务上。商业性贷款理论强调银行只应发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转移理论提出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预期收入理论为银行发放固定资金贷款和消费者贷款提供了依据，负债管理理论的提出则使人们开始重视借入款，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理论强调资产与负债的协调管理，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则提出在做好银行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拓表外业务。从中可以看出，银行每一步的业务发展都是与理论上的创新分不开的，反过来，银行每一次的理论创新都为银行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导。

虽然银行业务及理论随时都在创新，但大家最熟悉、印象最深刻、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则是近四十年来随着负债管理理论和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的创立而进行的业务创新。

20 世纪的 60 年代，随着负债管理理论的出现，西方商业银行为适应激烈的竞争需要，纷纷开发出一些新的既能灵活方便地支取、又能给客户计付利息的账户存款形式，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充分满足了存款者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要求，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客户。比如 1961 年由美国花旗银行首先开办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既吸收了定期存款期限固定的特点，又实行面额固定、不记名、可以转让，因此避开了定期存款利率最高限的限制，从而成为公司、养老金协会、政府机构和个人的主要投资对象。

西方金融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发展和开拓业务的。比如下面我们提供的两例规避即有管理法规的吸存创新。第一例是绕开 Q 条例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的限制，创新 NOW、ATS、MMM 和隔日回购协议等新的存款品种。

1970 年，作为努力寻找法律管制漏洞的结果，马萨诸塞州的一家互助储蓄银行发现了对支票存款禁止支付利息的法规的漏洞，从而发了横财。实际上，只要把一种支票称做可转让提款通知书（NOW），可签发这种通知书的账户便可以在法律上不被作为支票账户看待了。这样，NOW 账户便不受有关支票账户法规之限，可以支付利息。在两年的讼争后，马萨诸塞州的互助储蓄银行于 1972 年 5 月获准发行支付利息的 NOW 账户。继之，1972 年 9 月新罕布什尔州的法院确认了 NOW 账户在该州的全法性。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在支票账户存款上受到来自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他们发动了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场运动来阻止此类账户向其他州蔓延。结果，是美国国会于 1974 年元月通过法令，把 NOW 账户限制在新英格兰的各州之内。1980 年，法律最终还是允许了全国各地的储贷协会、互助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开办 NOW 账户，同时信贷协会的类似账户（股金汇票账户）也获批准。

另一种能使银行对支票账户支付利息的创新是自动转换储蓄账户 (ATS)。在这种安排中, 支票账户中王码电脑公司软件中心定金额之上的余额都能自动转换为支付利息的储蓄账户。当对自动转换储蓄账户签发支票时, 必要的兑付支票资金会自动地从储蓄账户转到支票账户上。这样, 可得利息的储蓄账户上的金额实际上成为存款者支票账户的一部分, 因为它们是可签支票的。然而, 从法律上说, 这是一种储蓄账户, 而不是向存款者支付利息的支票账户。商业银行向他们的公司存款者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 ATS 账户, 他们利用一种所谓“清理账户”来从事隔日回购安排。在这种安排下, 在一家公司营业终了时, 其支票账户一定金融以上的存款都“全数清理出去”, 投资于隔日回购协定上, 而这项交易是向该公司支付利息的, 即这家公司购买财政部债券, 而银行同意于第二天以稍高的价格回购这些债券。同样, 尽管支票账户在法律上不支付利息, 但该公司实际上还是在它可以签发支票的存款余额上获得了利息。

MMM 即货币市场互助基金, 它也是为了规避存款利率上限和法定准备要求的管制而产生的。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发行一种股份, 这种股份可按固定价格 (通常是 1 美元) 以开支票的方式兑现。此外, 你还能对这些以股份形式持有的存款签发支票。尽管货币市场基金的股份实际上是有利息的支票账户, 但它们在法律上并不是存款, 因而不受法规限制, 可以支付高于银行存款的利率。第一家 MMM 是由华尔街两名离经叛道者布鲁斯本特和亨利布朗于 1971 年创设的。然而, 1971 ~ 1977 年, 市场利率很低, 使得它们不比银行存款有特别优越之处。1978 年年初, 当市场利率攀升超过 10%, 比起 Q 项条款规定的上限 5.5% 高出许多时, 情况就迅速发生了变化。1977 年, 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资产只有不到 40 亿美元, 1978 年增至 100 亿美元, 1979 年超过 400 亿美元, 1982 年则达到了 2300 亿美元, 现在, 它们的资产

约为 5000 亿美元，至少可以说，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是一项成功的创新。

第二例是绕开存款保险最高限制，开发了经纪人存款。

通过经纪人存款，可以使那些想快速增加资金来源以从事高赢利项目的银行和储贷协会通过发行比竞争对手更高利率的有保险的大额存单来吸引必要的资金。如果没有存款保险，高利率也不会促使储户给冒险精神极强的银行提供资金，因为它们有可能血本无归。但是有了存款保险就会促使储户将款项存支付最高利息的银行。经纪人存款可以帮助大储户 10 万美元的存款保险限制。如一个存款 1000 万美元的储户找到经纪人，通过经纪人将 1000 万美元分成 100 份，每份 10 万美元，分别从 100 家银行购进 10 万美元的存单。因为每份存单的金额都在各家银行 10 万美元的保险限额内，这样大储户的 1000 万美元都获得了存款保险。1984 年联邦存款保险机构曾经通过了一项规定，禁止大额经纪存款，但联邦法院的判决却推翻了这个禁令。

因此，西方金融创新并不像我们的一些商业银行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靠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不顾法律制度的规定去搞恶性竞争。同时，西方商业银行并不是为了创新业务而创新业务，更不是在搞什么“政绩”，他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方便客户，为客户提供系统的服务，这也不像我们的一些银行为了自己的政绩，漫无目的去搞创新，开拓业务，至于这些业务有何效果，能否方便客户，是否给客户带来更大的不方便，则并不关心。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又出现了一股金融创新浪潮，推出了上百种金融工具，使市场筹资、融资更为灵活方便，适应了多层次的市场需求，增加了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这股创新又以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的出现和发展表外业务为基本特点。这些表外业务基本上分为三类，一类是由于出于规避风险而产生的创新，可称为转移风险的创新，如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

一类是出于在流动性和效益性之间寻求平衡支点而产生的创新，可称为提高流动性的创新，如票据发行便利、承诺循环贷款等；第三类是自发性金融创新，是为了适应各种投资者对金融不同需求应运而生的，如备用信用证、期货、期权等，可称为产生信用创新。

这次创新是有着非常现实的经济背景的。一是经济交往和资本流动日益国际化，使金融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二是金融证券化特别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三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四是现代电子技术和交通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表外业务的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非表内业务所可比拟。以美国银行业为例，花旗、美洲等五大银行集团 1985 年其表外业务活动量近 6000 亿美元，已经超过同期表内业务总资产 5300 亿美元的规模。1988 年五大银行集团表外业务活动所涉及的资产总和已超过 2.2 万亿美元，而同期这几家银行资产负债表项下资产总和为 7800 亿美元。表外业务的年平均增速为 54.2%，远远大于表内资产年 9% 的增速。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表外业务并不是脱离表内业务而独资发展，是在表内业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和表内业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化为表内业务。因此要避免国内有些银行的盲目跟风、凑热闹。同时表外业务本身也带有一定的风险，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不能盲目引进、照搬。三是银行通过提供表外业务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有利于银行改进资产负债管理技术。

第四节 中国银行业与创新

中国急需创新。中国的银行业更需要创新。从思想观念到行动方式、从开门营业到关门休息，一切都需要尽快改变，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需要。

一、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创新

无需讳言，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不说别的，单就其不良贷款来说，就足以让一些银行破产很多次了。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确切地说就是制度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多种尝试，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原因也就在其产权制度。中国银行的问题特别是国有银行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的问题基本相同。虽然改变了国有制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不改变国有制，这些问题肯定都解决不了。因此，中国的金融创新首先需要的是制度的创新。进行制度创新，就必然要从产权制度谈起。

产权，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从原始公有制解体以后产生的，包含在生产资料之中的问题也是由此开始出现的。从实质上讲，生产资料所有制自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其生产资料的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因而也就有了使用权，支配权。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正是由此出发进而控制社会的经济以至政治的。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质意义就在于此，它不仅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由谁支配和控制的问题。所有制是社会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但无疑，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所有制的全部内容中起决定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推翻资

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首要的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有意义的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规模庞大的股份公司（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造成了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这似乎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质的否定。我们的一些人也试图依此为依据探索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出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现实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往往是由代表股东的董事会聘请和任命的，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而且，在企业中拥有较多的股份，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就越大。这样，无论企业的经营者是不是企业的股东，他在经营过程中必然受着股东和董事会的监督 and 制约，在必要的时候，董事会要撤销、罢免经理。因此尽管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但并不是完全分离，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就是他必须对所有者负责，所有者对经营者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权和任免权。事实上，通过这样一种传导机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在表面上的分离就转化为实质上的统一。

在资本主义股份制度下，平均利润率规律和资本流向规律仍然起作用。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的所有者对其资本的投向要进行选择、决策。股票市场是进行选择，决策的场所，企业的经营情况，股票市场的信息是进行选择和决策的根据。这种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决定了他的资本被用来生产什么，又决定了用他的资本能生产多少。因此，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经营者拥有的权力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力量，即所收的股本和可借到的资金。

股份制度在造成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表面分离时，也必然地造成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的所有者来

讲，企业间的利润差别总是存在的，因此，他总是尽力把自己的资本投向能获得最大利润的企业。股东对经理的监督和任免，其目的也不过在于此。当然，股票的流动性，安全性等也是其考虑的因素，但又有谁能否定，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呢？对于经营者来说，放在其利益第一位的也必然是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收入。为此，他必须使企业获得最大的利润。从这方面讲，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由于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资本的所有者对经营者行动的干预总是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因此，企业经理在经营上能够有较充分的自主权。

从实质上讲，国家所有制与私有制一样，都是为了保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经营者有任免的权力，保证所有者归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有利于所有者的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问题上，国家所有制与私有制又是完全不同的。上面说过，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就在于获得最大利润。但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国家，其根本利益就不是获得最大利润，至少不是要获得私有制意义上的那种利润。相对于国家来说，政治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强大比单单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更重要。国家控制企业的目的，正在于要实现以上目标。因此，一般来说，国家是站在更高的层次来控制和管理企业。所谓更高的层次，即不是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

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国家本身既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实体。作为抽象的概念，国家是由无数复杂的内容组成的，而这些复杂的内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想得到的。在通常情况下，国家总是由人来代表的，但并不是由所有的人来代表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代表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代表国家的只能是少数人。而这“少数

人”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利益，这种“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总是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在这里，国家只能是一个抽象概念。作为具体的实体，国家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十多亿人口，矗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作为具体的实体，国家的利益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国家虽然仍是这种抽象和具体的矛盾统一体，但却表现为相反的形式作为抽象的概念，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名义上是大家共同所有，但实际上是谁也没有；作为具体的实体，国家又是由少数人作为代表，对生产资料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进行管理。这样，国家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即国家与企业经营者的矛盾，就表现为代表国家的人与经营者的矛盾。因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将全民企业概念改为国有企业，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面说过，在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由此决定了所有者对经营者的限制也是非常有限的，企业能够获利，既满足了所有者的利益要求，也实现了经营者的愿望。企业盈利不多、不能盈利或者亏损破产，损失的不仅是所有者的利益，而且也有经营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市场，受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正如上面所说，国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与私有制条件下的利益是不同的，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求企业承担诸如增加就业、社会稳定等种种义务。由于无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私有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不可能彻底消除商品货币关系（虽然可能消弱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是从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从自身利益出发。这就形成了国家与

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的矛盾。国家的利益以及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国家必须而且有权对企业在经营者任免、劳动力分配、职工工资、价格决定、扩大再生产、收入分配、信贷资金投向等方面进行最后的决定。而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又决定了他要根据市场和经营情况自由解雇工人、自行制定工资、自己决定商品价格、决定企业的收入分配和扩大再生产。这样就会出现企业行为与国家利益背离的情况。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行使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力，对企业的经营者实行尽可能的控制。正因为如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认为，中国的国营工厂不能说是通常意义上的企业，“中国不存在企业，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他说，日本的大企业一般有以下功能，统辖企业内部各单位的日常生产活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新的业务有关的活动。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进入新领域、建设新工厂。进行与新产品、新领域、新市场和新顾客有关的销售活动。筹措扩大事业资金。决定职工的录用、升迁、进修和工资以及奖赏。这些功能都是扩大再生产的功能。经过 1983 ~ 1984 年的改革，中国的企业仍然不具备这些功能。

长期以来，人们把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归因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认为是这种高度集中管理统死了企业。其实，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相适应的，是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利益、实现经济增长的惟一可行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正如上述，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所有者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又总是放在第一位的，利益的不一致必然导致行动的不一致，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必须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尽可能的控制，为了解决就业，企业不能自由减少、解雇工人；为了安定人民生活，企业不能随意提高物价；为了保证国家集中必要的

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重点”建设，企业不能自己决定扩大再生产；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企业甚至做亏本买卖。第二，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国家对经营者的种种控制，必然会严重削弱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就反过来要求有更严格的指令性指标“逼迫”企业完成。由于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企业承担的种种义务，造成企业的经营管理及生产成果无法准确的衡量，又由于在传统观念中，产值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这样，以产值为中心的一套指标必然以指令的方式下达给企业。第三，经营者与职工积极性的削弱，必然表现在企业在原料的来源及产品的销售方面没有动力，不负责任。为了能使扩大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国家对物资的统收统配、统购统销也就是必然的。第四，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必然导致企业在外延扩大再生产上没有权力（虽有动力），而在内涵扩大再生产上缺乏动力（虽有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以严格指令性指标和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保证来实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这种人财物、供产销的指令化、计划化，实际上严重削弱了商品货币关系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可以大大削弱商品与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不能完全消灭它。那么，在国家所有制下的商品经济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就是：①互相依赖，即联系的广泛性。商品经济没有严格的部门、行业界限，各企业、各部门之间互相依赖，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②互相对立，即互相竞争。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商品生产者活力的表现，也是商品生产者互相独立的表现。③渗透性强。商品经济一旦发展起来，就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把社会的一切都

打上商品的烙印。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即时间效率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但是，国家所有制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要求，正如上述，它要求企业承担种种义务，并要对企业进行较多的控制。这种特点和要求并不以商品经济而改变，这就形成了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具体表现为：

(1) 国家所有制要求企业的活动以国家为中心，以完成国家任务为己任，接受国家的行政指导甚至命令。而商品经济则要求企业以市场为中心，接受市场经济杠杆的调节。

(2) 商品经济要求企业成为责权利相结合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但在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受国家行政干预，不可能自主经营；由于企业承担种种义务，其经营成果无法准确衡量，企业也就不可能自负盈亏。而且，在国家所有制下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企业经营者及职工没有多少货币收入，更没有多少货币结余，这样，他们也就无法负担得起企业经营及建设的损失。

(3) 商品经济要求以实现利润的多少考核企业的生产情况，并且利润也是考核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惟一现实的指标，但是，国家所有制要求企业不能以利润特别是眼前利润为经营目标，而且在国家所有制下利润也无法成为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标准，产值指标本身包含的可能是不计成本、不计盈亏，这也是商品经济所不能容忍的。

(4) 商品经济要求企业对市场情况做出灵敏的反映，灵活调节企业的生产规模，必要时可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向，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只顾产值不顾市场情况，而且，这时的企业由于承担的种种义务及种种限制，很难对市场情况做出准确、灵敏的反应。即使能够作出反应，由于从认识到市场情况到改变企业活动

要经过一个“多余”的中间环节即国家审批，这样，原来反映的效果很难实现。

(5)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企业讲求效率真是难比蜀道。首先，国家审批这一环节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企业的效率。上面提到，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与企业经营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代表国家的人（企业主管部门等）与经营者的关系，这就为官僚主义的产生铺下了温床，往往一个问题、项目的审批、处理要经过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单位，扣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图章，哪一个环节出了故障，都会使希望化成泡影，这样关卡重重，效率可想而知。其次，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义务，商品经济中的资本集约往往转化为劳动集约，这不仅可能造成企业单位人浮于事，一个人的饭几个人吃，而且也限制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新技术的应用。第三，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分配由国家决定，并实行终身雇佣制，由于职工的利益、兴趣等原因，其积极性不一定能得到充分发挥。

(6) 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各部门、各企业是相互依赖的，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为了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通过主管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两条渠道进行管理，这不仅造成人为的经济分割，而且造成条条管理与块块管理之间的矛盾。而且，商品经济要求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建立一业为主，配套生产的经济区域。但在国有制条件下，由于各行政部门（政府机关）肩负着发展本地经济的任务，本地企业的产值如何，直接决定他们的名誉和地位，因此各级机关都下大力量抓本地经济发展，“画地为牢”、“地方割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多种经营的形式，一方面破坏了商品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原则；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由主管部门（对口单位）进行管理。这样，各级政府机关机构

越来越多，官越来越多，关卡也越来越多。

(7) 商品经济要求价格成为一个有效的经济杠杆，灵敏反映市场各种商品的供求情况以调节企业利润，调节社会经济结构。但国家所有制要求保持市场价格的稳定，这就失去了价格作为经济杠杆的意义。价格定的高的行业，企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丰厚的利润；价格定的地的行业，企业不管怎样努力也难以盈得同样的利润（产值），甚至难以自求平衡，这样就使企业（不论是“盈利”企业还是“亏损”企业）及其职工的积极性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补偿亏损企业的损失，国家就要实行价格补贴。正是这一“补贴”，不仅没有能调动亏损企业的积极性，反而又进一步削弱了原来盈利企业的积极性。

(8) 商品经济要求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随着企业的经营成果的变动而变动，同时要求企业的经营者根据每一个职工的工作情况确定相应的工资，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这样工资就成为刺激工人劳动积极性的一个杠杆。但在国有制条件下，工资由国家规定，与企业经营成果几乎没有关系。企业的收入不属于经营者。因此，经营者无权决定单个职工的工资。国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而产生，往往被国家作为消灭收入差别的依据（能不能消灭暂且不谈）。因此，在职工工资收入的决定上，不仅国家不好制定差别较大的工资收入制度，企业本身在奖金的分配（有限的工资权力）上也只能实行轮流“奖赏”。这样的结果是，在工资收入方面大家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国家规定和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不仅丧失了工资作为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的经济杠杆的作用，反而削弱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培养了惰性。

(9) 商品经济要求根据市场情况和盈利可能自行决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新企业的投资，并对投资承担责任。但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是国家的，企业的投资并不决定于企业的盈利情况，企业对国家资金也不可能负损失的责任。而

且企业的产值又直接决定于企业的生产规模。这样在国家所有制下始终存在的是投资饥渴症。

(10) 相对于金融企业来说, 商品经济要求利率成为资金的价格, 要求信贷资金流向经济效益高的部门、企业、行业, 但在国有制下, 利率由国家制定, 金融部门肩负着支持、配合国家实现经济目标的任务, 也肩负着帮助企业完成国家下达指标的任务。这样在资金的投向上必然是按计划, 在资金的供应上必然是有求必应。这时的效益、偿还往往成为空话。

总之, 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不仅使它本身, 而且使社会的一切方面都成为国家的所有物。这样, 在社会中就不存在经济上的个人风险, 更不存在对风险的承担。这是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盈亏对称、权责对称、功过对称不相容的。因此, 商业银行决不能采取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式。

如果说, 商业银行实行产权国有或集体所有都不行, 那么, 合作制又怎样呢?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 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社员同等出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受益、并积极参与其活动。国际公认的“合作社7原则”成型于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曼彻斯特会议, 提出1844年Rochdale公平开拓者协会7原则和1966年国际合作社联盟4原则。主要内容是: 自愿与开放原则; 民主管理、一人一票原则; 非赢利和社员参与分配原则; 自主和不负债原则; 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 社际合作原则; 社会性原则(史纪良2000)。具体到我国的合作金融定义上, 根据1997年版《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以下称“97规定”), 合作制可理解为“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 1998年的《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整顿规范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1998〕145号，以下称“98方案”）基本沿用“97规定”的定义，把合作制原则解释为“自愿入股、民主管理和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因此，无论国外国内，合作金融的基本经济特征应该统一表现为四个内容：一是自愿性；二是互助共济性；三是民主管理性；四是非赢利性。以上特征表明，合作金融机构在理论上似乎更接近准政府型的公共机构：由成员自行决定参与与否；无论股份多寡实行一人一票制，而非通常竞争性机构的一股一票制；没有自己独立的效用函数，而是各成员效用函数的累加。与此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不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不存在实质意义的合作金融组织。那么，到底实行合作有什么条件？合作制有没有前途？我们在此不妨做一探讨。

所谓合作经济，就是自愿的联合而做的经济，是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在经济上的表现。合作经济的产生，正像人们之间一般的互助合作的产生一样，也正像人组成人类社会一样，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在遥远的原始社会，由于人的生产力水平低，不仅在正常的情况下生活没有保障，而且一些自然灾害，如水、火、冷、热等给人们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当时人们还受到野兽的袭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延续，必然（必须）由若干人组成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一个的集体，就是人类社会的雏形，也是合作经济的最初和典型形式。在这样一个合作经济组织里，生产资料（其实当时谈不上有生产资料）实行公共所有。每一个人也自然（自觉）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集体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来使用。这是人们为了个体的生存（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而实行联合起来的一个范例。在这样一个经济组织里，由于人们所生产的东西很少，不足以维持每一个人的温饱，因此在分配上必须实行平均主义。

原始社会的合作经济，几乎谈不上拥有劳动资料，劳动的对

象是无边的自然界，这也不是每一个人个人所有的，人们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这种合作经济基本上是劳动力的合作，即合力而作的经济。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不能生存，其他就无从谈起。因此，生存是人类合作的第一动机。事实上，在人们的生存有了基本保证以后，为了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也要求实行合作。正如上面所说，多层次的生产力表现为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内部的每一个成员之间发展程度也不平衡。这样就形成了至少有三个层次的生产力结构。第一层次是除了哪些非常落后的原始生产力以外的虽有生产资料，单靠单个人生产不足以解决温饱的生产力水平。这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我国农村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仍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这种生产力水平虽较原始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处于自给经济阶段。第二层次是温饱问题虽能基本解决，但依靠单个人的力量仍不能继续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这种条件下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经济。可以看出，自给自足的经济虽然比自给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产品几乎没有剩余，因此没有交换，商品生产也就不会发展。这是处于交换经济之下的生产力水平。处于以上两个层次的人们，为了突破自身的限制，使自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然要求合作。这时只有合作是最有效的途径。第三层次是人们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有一定的剩余产品可供交换以满足自己多样化的需求。这种以交换为目的进行生产的经济是交换经济。与交换经济相适应的生产力是当今社会最高最发达的生产力形式。处在这一生产力水平的人们一般不会有传统意义的合作。因为他们拥有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生产资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合力合资而作的经济产生了。这是合作经济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大提高。

从合作经济的产生可以看出，合作经济具有以下特点：①合

作经济首先是劳动力的合作，即合力而作。尽管后来发展为合力合资而作，但合力而作仍是首要的内容。②合作组织的所有人员都是合作社的成员，因而不存在雇工经营。③参加合作组织的成员坚持自愿互利原则，有携带资产进出组织的自由。④合作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

合作经济本身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矛盾，是一个多重矛盾的复合体。

合作经济由于其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上面说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质不仅在于它是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支配别人、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手段。但是实际上，能够控制、支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是处在落后或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合作经济由于其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合作者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可能对社会的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对社会的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合作组织还常受到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的支配、控制和限制，从而依附于先进的生产力。这就是合作经济的脆弱性。合作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它为先进生产力（代表者）变革的可能性。

合作经济存在的另一矛盾表现在收益分配和生产决策方面。合作，首先是生产上的合作，是超过一个人的事情。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生产决策上存在分歧。在自给经济中，是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这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暂时低掩盖了在生产决策上的矛盾和分歧。在自给自足经济中，这一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一个喜欢土豆，一个爱吃红薯；一个愿吃大米，一个宁要小麦。在交换经济里，这种矛盾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个人为种植蔬菜收入高些，另一个认为种植药材能赚大钱；一个认为生产罐头能获厚利，另一个认为养鸡生蛋能卖高价。在收入分配上，在

自给经济里只能实行平均主义，一个人多占，另一个就有可能饿死。而且由于大家一般都是共同劳动的，因此矛盾也不明显。在自给自足经济里，由于这种合作已不再是单纯的合力而作，生产资料的合作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单纯的按劳分配就不公平了，而按资分配到底应占多大比例，这是很难合理解决的问题。因此，分配上的矛盾已显露出来。到了交换经济阶段，生产资料的合作在合作经济中占的地位更加重要，实行按资分配的要求必然大大加强，围绕着收益分配的矛盾必然也进一步激化。不过，这时只要按劳分配仍占决定性地位，矛盾也仅是合作成员之间的，不存在雇工的情况，就仍然是合作经济。

合作经济本身还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本来，合作经济并不排斥商品生产，但合作经济在自给和自给自足阶段是小生产经济，在交换经济阶段是小商品生产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是不相适应的。因为农业中的合作经济，由于现代化大机器的应用，必然节省出大量的劳动力；工业中的合作经济，由于现代化大机器的应用，必然需要雇佣大量劳动力；农工相结合的合作经济，在不同行业的合作成员的收入分配上又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矛盾。因此，总的来说，传统合作经济阻碍现代化大机器的应用，阻碍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因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合作经济内部实行的完全平等的民主原则，与现代商品经济也是不相适应的。商品经济要求商品生产者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因此要求有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这就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合作经济内部的民主原则。

合作经济的以上矛盾决定了其分化的必然性。合作经济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利用合作者各自的优势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互助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合作的条件逐渐丧失，合作组织内部的矛盾也必然充分暴露出来，从而成为继续合作的障碍。另外，合作经济的脆弱性，是与合作者固有的愿望不

相容的，他们绝不可能甘愿把自己放在被摆布、被统治的地位。因此，合作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走向分化就不可避免。

传统观念认为，合作经济是一种公有制经济，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经济形式。其实，根据合作经济的特点，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合作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小私有制经济。因为，虽然在合作的时候，每一个合作者的生产资料被大家共同的占有，但这里除了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者外，其他人拥有的只是使用权。因为每一个合作的成员有携带其生产资料进出组织的自由，这实际上就表明了对他自己的生产资料拥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承认。因此，合作经济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联合使用的经济组织，而不是联合所有的经济组织，从现实看，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

我们很多同志还认为，合作经济是比股份经济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经济形式。其实不然。在合作经济里，每一个合作者都可以随时把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抽出来，这在某种情况下对其他合作者来说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相反，在股份经济里，入股者虽可以转让股权，但不能退股，资金一旦投入，就永远归企业使用。这说明，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说，二者都属于私有制；而就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来说，后者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也就说明后者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方面比前者要高。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把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区别开来。从二者的联系方面来讲，集体经济确实是合作经济的转化形式。但是合作经济本身并未包含有向集体经济转化的必然性。实际上，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合作经济包含的是向股份制转化的必然性。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质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合作经济必然由原来的合力而作占决定性地位向合资而作占决定性地位转化。这样，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合作经济中的生产决策和收入分配中

的地位也突出出来，并越来越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的合作经济就成为现代股份经济的雏形。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合作经济中原来的劳动力的合作的作用完全消失了，从而就形成了现代形式的股份经济。

合作经济向股份经济转化的必然性，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且不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股份化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国家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事实。《经济新闻报》1986年10月14日《上海联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剧增》一文说，根据对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19个基层人民法院的调查，到8月底为止，联营纠纷案件分别比去年全年增加了3.6倍和10.6倍，联营的失败率正呈上升趋势。另据《中国青年报》1986年11月18日《由联合体纷纷垮台想到的》（作者刘来）说，作者在陕西省阳高县五官屯镇发现，该镇有七个商店、旅店、杏脯厂等农民联合体，纷纷在“出生”以后不久就夭折了。究其原因主要由三：①多头管理。由于观点不一，意见分歧，导致在经营管理中出现一些失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问题出现后又互相推托，无人负责。②财务制度不健全，你说我花得多，我说你吃得多，彼此双方你猜我疑，勾心斗角，最后只好分道扬镳。③分配上的“大锅饭”。联合体的劳动报酬和股金分红，没有较为合理的规定，每个成员工作好坏、贡献大小从无区别和考核，体现不了多劳多得。有的联合体成员盈利后伸手分红，亏损后撒手不管。应该指出，由于我国的商品经济过去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合作经济直接向股份经济转化的并不普遍，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的改革的基础上各种专业户联合体就发展起来了，出现了联合体向股份制企业过渡的情况。而四川、江苏、山东、湖南等地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末以后实行资产折股联营的改革后，就取得了良好效果。

总之，商业银行制度创新的前提是产权关系必须明确，责

任、权力、利益必须清楚。也就是要以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来规范和改革。

不改革目前的产权制度，就不可能解决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在目前人员素质整体偏低的情况下，改革产权制度并不一定能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但不改产权制度就肯定不能解决好目前的问题。

改革的思路要拓宽，要重新探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能被现在的公有制观念约束住我们的思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能都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公有制并不一定是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至于现在实行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九章风险管理中加以说明。在此需要提出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管理人员的不负责任提供条件和理由，而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因此，实行国有制不行，多种所有制并存更不行。

二、中国银行同样急需业务创新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中国的承诺，中国将在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外资银行可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据分析，外资银行进来后并不会通过广设机构与中国的银行业竞争，而是通过对跨国大公司、优质客户及网上业务的竞争与中国的银行业展开较量。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中国的银行业没有时间可等，只能在逐步改革和完善制度的同时加快其业务创新。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金融创新的关键是加快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金融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发达国家金融业的网络化十分明显。比如，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尽管纽约证券交易所仍然占

据着龙头老大的地位，但是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报价系统用电子计算机联结起来的“虚拟交易网”，也具备了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呼风唤雨的影响力，纳斯达克指数成为全球重要的股票价格指数而被关注。

尽管美国是互联网的开山鼻祖，且在网络业务发展上占据全球霸主地位，但欧洲人却在开拓网上银行方面捷足先登，在网络银行的开发和运用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看到传统银行给人们带来的不便，英国的银行家率先在欧洲大陆上刮起了一阵“自助风”，创立了一种“自助餐式的银行”。由于这种银行没有窗口，也不需排队，所有项目都可由客户在机器里独自操作，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受到人们青睐。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迅速发展，自助银行也纷纷“嫁接”上网，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网上银行的风潮。难怪有人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要姓“e”了，或者说，这已是一个“e”化的世界。

美国花旗集团负责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总裁爱德华·赫罗维族曾表示，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互联网的世界让他们不得不提供相关的网上服务，促进客户的交易顺利进行。他们的互联网战略是：将传统的金融服务形式转变成电子化的形式；创造新的服务系统，使之与花旗银行全球的分支网络结合在一起；发展与相关企业的关系，发展可能的客户联系；跟各国政府共同合作，制定有关的国际商业规则，使网上金融运作更为成功。

展望未来，下一代互联网很可能将不仅仅建立在个人电脑的基础上，移动电话和其他信息工具亦将成为其载体。届时，现在的部分电子商务很可能会更名为“移动通信商务”，金融业亦需相应做出战略调整。花旗银行已经在东欧成功地开展了蜂窝电话银行业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许可以用自己的“万能”手机来解决各种往来账面事务，享受到金融“无线网络”化的便利。

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竞争实力的银行，之所以能够面临银行间激烈竞争的挑战和挑剔客户的多种服务要求压力，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都把紧跟信息技术最新发展，建立强有力的银行信息系统，作为持续提高银行经营效率、改进银行管理决策水平、为客户提供全天候、全方位、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基本手段。

发达国家银行电子化历程表明，金融科技从“被动”的银行服务部门，发展为在银行变革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力军，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将金融业务拓展、金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变革和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计算机、通信、系统模拟仿真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有机融合是基本动力。其特点是各家银行都把建立共享计算机硬件、软件和信息资源为目的，将具有独立功能的多个计算机处理系统互连，提供信息处理、传输、交换等应用服务功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作为基础立足点。其基本方针是：

(1) 扩大金融服务业务范围。在传统银行业务基础上，扩展诸如家庭银行（HB）、电子资金转账（EFT）、电子数据交换（EDI）等服务业务。设计开发新型金融交易衍生工具，转移防范金融风险。

(2) 推进国际金融服务业务。以环球银行金融通信系统（SWIFT）为依托，提供全天候客户汇款与支票，银行资金调拨、清算、外汇、证券买卖，托收与信用证，旅行支票，贵金属买卖等跨国金融服务业务。

(3) 转变传统银行经营收益机制。将银行收益以存、贷差为主，转向以金融信息服务和扩展非银行服务业务为主体。以计算机网络环境支撑的金融管理信息数据为基础，大力加强金融信息的采集、管理与应用拓展。

(4) 防范金融风险。银行的全开放、国际化发展，促使银行间往来业务的急剧增长，引发因一家银行一个国家银行金融风

险，波及形成的地区，甚至世界范围金融风险。以系统模拟仿真技术为工具，金融工程方法为手段，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防范信息系统，强化支付清算、通货膨胀控制、资本账户可兑换控制和金融监管转移、化解风险。

(5) 开发综合性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充实提高集银行业务处理，金融经营管理、信息服务、管理决策支持功能于一身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的综合信息服务功能。

我国银行电子化已经历了主处理机后台批处理，主处理机联机事务处理和计算机网络事务处理的三个发展阶段，当前面临金融工程、网络计算机、发达国家综合性银行管理信息系统将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发展成熟、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启动发展的大好形势。但是，我国银行电子化总体水平，尚处发达国家银行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发达国家银行电子化过程中都已出现的问题；二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表现为：

(1) 银行信息化基础结构（BII）工程特别是网际互联网络建设缺乏总体规划指导。

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充分调动多种经营机构效能的金融调控体系，已经在我国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职责分工，经营权限和各行分支机构地理覆盖范围的差别，要求每家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行属专用计算机网络系统，才能确保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法人行为的有效实施。行属计算机网络系统是各行生存竞争的技术基础。但是，由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交互性，跨地域，甚至跨国家特点，商业银行行

际业务交往引发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金融业务往来关系，必须建设横跨各行属专用计算机网络的网际互联网络，才能形成有机协调的我国银行体系。

因此，由银行经营、服务、管理需求所驱动的金融系统各部门专用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必然要求网际互联网络的发展；而网际互联网络的完善发展，又促进了各部门金融服务业务的新增长，进一步要求各行属专用计算机网络的更大发展，这种往复促进关系，以各专用计算机网络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促进我国金融行业各部门电子化工程的深层次发展。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制定银行信息化基础结构（BII）建设的总体规划，合理界定网际互联网络、各部门专用计算机网络的功能目标、体系结构，开发建设促进部门计算机网络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的网际互联网络，为各部门专用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提供完备的互联服务，创造宽松的环境条件。

（2）银行计算机网络（BCN）技术和网络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改进提高。

我国各家银行计算机网络发展，受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条件限制，传输网起步于地面电话模拟专线网和专用卫星通信网络。近年来随着公用数据通信网络的迅速发展进步，已经逐步升级换代为 X·25，FR 和 DDN 网络等。各部门的专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水平，也都有所提高。但是，由于金融科技部门还缺乏建设规模大、节点多，地域覆盖范围宽的，资源共享计算机广域网络的丰富工程实践经验，诸如公用数据通信网的计算机网络接入技术；多协议异构局域网、广域网互联技术；增值信息服务网络技术；大型复杂网络系统的网络管理技术；计算机网络系统控制技术和网络系统的安全可靠性等一系列网络工程技术问题。特别是网络系统及信息的安全可靠性，对于银行就意味着“资金”，是银行赖以生存的保证，在我国银行计算机网络深层次发

展时，必须制定完善的安全策略规范，通过工程实践提高技术水平。

(3) 银行业务发展与科技进步有机融合不够，金融工程发展尚处起步阶段。

我国银行业务电子化，基本是传统银行业务处理流程和经营管理模式的电子化再现，如原始凭证数据合法性、完整性、有效性确认，传统方法是印鉴识别，然而对电子资金数据，技术实现是困难的，但有关银行规章制度，又没有确认电子签名方式的合法性，致使电子资金转账（EFT）系统的效能受到限制。加之工程技术与银行业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的金融工程发展，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金融风险的防范、转移和化解，金融市场的开拓和运行，都缺乏定量化的工程工具进行规范、指导，使银行新业务的发展、市场开拓和金融风险防范，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4) 网络化银行业务信息传输格式、用户系统接口标准。尚不完善配套。

我国银行的计算机网络体系，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专用计算机网络互联覆盖全国的复杂计算机网络系统，制定相互补充、互相配套的银行业务信息传输格式、用户系统接口标准，是确保金融业务数据在网络环境下互联互通的“行际通用语言”，不仅是行际网络互联的基础保证条件；也是银行业务应用软件系统规范化；金融信息资源共享；我国银行业务国际化和计算机网络增值服务业务的基础；将极大地提高金融计算机网络的使用效率。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基础标准的制定尚不完善配套，影响银行业务的规范化。

(5) 综合性银行事务处理、金融经营管理和决策支持系统，亟待发展完善。

我国银行电子化起步于银行业务事务处理系统电子化，银行经营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也以传统会计报表为基础的统计报表

为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冲击，采用金融数学工具和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用系统工程方法，建立金融资产运作环境、动态、趋向的定量化数学模型，为金融经营管理决策提供辅助手段和工具；应用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跟踪、预测银行客户的发展动向，为银行业务策略、市场开拓提供定量化的依据；以金融工程方法，开发、设计安全可靠，风险小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开发人一机界面友好的多媒体综合性金融管理信息系统，是我国银行面临的急迫任务之一。

(6) 综合型高级金融人才亟待培养。

随着金融数学、金融工程的迅速发展和银行业务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渗透，金融工程专家，将把设计、开发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开拓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作为自己的职责，在银行业务革新、金融市场拓展中，发挥主导作用，金融、科技有机结合型的高级金融人才，比起金融、计算机应用技术复合型系统分析人员，具有更为坚实的金融数学、金融业务、金融发展策略专门知识，需要通过工程实践逐步培养、锻炼、提高。

适应我国银行电子化深层次发展需要，从而实现银行业从传统的信用中介资产服务到综合性金融信息服务的转变，规划银行业务体系与工程技术有机融合的银行信息化总体蓝图，调整、重组银行信息系统的网络体系结构，系统体系结构，数据体系结构 and 应用软件体系结构，是我国银行电子化深层次发展的基础。在网络就是计算机的时代，我国金融系统的计算机网络，是把银行体系各部门及其信息系统有机维系在一起的桥梁，并通过它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部门和广大银行客户联结，将我国银行业推向国际金融市场。因此，我国银行信息系统总体框架的基础是金融计算机网络，核心是银行数据库和银行数据仓库，他们共同支撑着

银行支付事务处理系统、银行经营管理信息系统、银行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外汇国际业务系统等四类银行应用软件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

面对我国金融体制改变继续深化，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激烈，金融业务国际化发展，金融风险加剧的巨大压力，全面分析我们面临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进步，并与金融业务有机融合的有利形势，抓住机遇，制定我国银行电子化深层次发展策略，对实现我国银行信息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发展金融工程，重组银行信息化部门，促进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金融行业既是高收益的行业，也是高风险的行业，为防范、化解、转移金融风险而产生的狭义金融工程，是研究、开发金融风险转移市场金融衍生工具——期货、期权、掉期交易的系统工程学，采用金融数学工具，系统论方法，计算机科学技术，特别是仿真技术模拟金融市场的运营，有力地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形成、发展、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向金融领域的渗透，使两者有机融合且发展至今日，凡是金融信息化所解决的金融业生存、发展、经营管理等问题，都已成为广义金融工程的研究范围，广义金融工程已经成为研究、开发银行信息系统的有力工具。而传统的我国银行科技部门，按传统习惯，都是基本由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组成的科技服务部门，从总体上看，无论知识结构，或是提出、思考、解决金融工程技术问题的方法论体系，都还没有脱开自然科学技术方法范畴，还没有足够能力在金融新产品、新工具、新服务的研究、设计、开发中发挥主导作用，银行科技部门基本是电子化工程建设、维护的技术服务部门。因此，将传统银行科技部门重组为包括金融业务、金融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专家的信息技术发展部门，开展金融工程研究、开发工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务与信息技术的

渗透融合，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研究、设计、开发全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强化金融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开拓金融市场，将成为银行业务于工程技术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的银行信息技术发展部门的重要职责，并通过工程实践培养金融、科技结合型高层次人才。

(2) 加大银行信息化投资力度，建设安全可靠的金融计算机网络。

金融计算机网络不仅是把我国银行系统各部门及其信息系统有机维系在一起的桥梁，而且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网络把计算机的 CPU 及其软件变成“外设”，自身则处于中心地位，网络就是计算机。因此，加大我国银行信息化资金投入力度，建设技术先进、系统可缩放性、可管理维护性和安全可靠性的金融计算机网络，是网络计算模式环境下，我国银行持续发展，迈向国际的重要基础。适应我国金融计算机网络，是金融系统各部门逻辑功能独立专用计算机网络和网际互联网络互联组成的金融专用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特点。

(3) 转换银行经营策略，以客户为中心，信息服务为手段，提高银行经营效益。

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策略是，最大限度地吸纳扩大银行客户数量占据市场，以规模效益为其获得最大收益的基本方针。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的分割，客户数量难以不断增长。促使商业银行必须由注重客户的业务交易，转变为注重与客户的深度关系，最大限度开发每个客户个体的价值，获取深度效益。因此，以客户为中心，开发集成化银行服务应用软件系统和综合性金融服务客户信息数据库，分析、预测客户的未来发展和市场前景，主动地适应客户动态变化的多种金融服务要求；设计、开发符合客户经营管理目标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跟踪、监测客户的状况，促进银行产品、服务销售；与客户建立长期的永久的协作伙

伴关系。银行经营策略的这一新变化，必须掌握客户全部信息的信息技术部门，给予银行前台营业部门全面的支撑，集成化、综合化的银行应用体系结构和银行信息系统是基础，要为银行服务提供客户账户信息、会计核算报表、账单、银行各部门协同服务信息和多媒体用户界面。

(4) 开发集事务处理、协调管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于一体的综合性银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我国银行的信息化。

我国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缺少完善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共享金融数据库、数据仓库和有效的辅助决策支持模型和方法支撑，一直是制约我国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综合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金融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完善、信息采集渠道畅通；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管理运行机制的逐步趋于稳定，为研究建立面向高级管理决策者个人，以其管理经验为基础，扩充其管理决策智能范围为目标，充分调动决策者个人主动性的决策、预测辅助模型库和方法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此，研究制定逐步完善的金融管理信息指标体系；研究建立如下重要的金融宏观决策模型。对于开发集事务处理、协调管理信息、决策支持系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我国银行信息化，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时报》1999年7月24日）。

第七章 秩序观念：法律和社会规范是银行的保护神

引言 经典与案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读解：孔子说：“用法制禁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统一百姓的行动，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统一百姓的行动，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就会自觉地走上正道。”

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容侵害

之一：金融服务，应依法而行

北京曾发生了一起投诉金融企业的事件。案情大致是，一王女士 1996 年在北京海淀区一家储蓄所办理了一笔 1 万元港币的定期存款。1997 年该存款到期，她丈夫到该储蓄所办理了转存手续，将到期存款连本带息续存 1 年。今年夏季的一天，该存款又快到期了，因为他们欠朋友的钱急需归还，就将该存单交给了那位朋友。可是这位朋友到银行取出钱后给王女士打电话说，你

存的钱不是 1 万多元，而是 1000 多元。王女士顿感疑惑和歉疚。经过交涉，该储蓄所和上级行为王女士查了账，结果是 1997 年办转存时，王女士的丈夫取走了 9500 元，仅转存了 1000 多元。当王女士提出要看转存时的存单时，发现储蓄所出示的存单，不是她丈夫亲笔所写，而是别人代填的。王女士要求银行方面对此作出解释。储蓄所的一位女营业员并不否认这个事实，她说存单是她代填的，原因是王女士的丈夫当时称他本人不会填单，她是应客户要求“代客服务”。王女士说，我们两口子都是大学生，丈夫是一位科技工作者，他不会填存单？谁信！

王女士与银行的纠纷，虽说这笔钱的去向一时无法确定，但很明显的是那家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存在违规操作，责任是不容质疑的。

之二：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不久前，一名中年男子手持身份证和公安机关开具的查询证明，匆匆来到浙江省松阳支行古市分理处，称其妻林某意外死亡，存单下落不明，因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来到该处查询，要求查询其妻林某的存款情况并申请办理挂失手续。

营业员小陈明白中年男子的来意后，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心想他妻子若真有钱存在这里，就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找到，对于一直沉浸在丧妻悲痛中的他，这也许是一种慰藉。她一边安慰他，一边迅速打开电脑进行查询，查询很快就有了结果——“林××，活期存款，余额 4000 元”。小陈想马上为其办理挂失手续，可一转念，顾客提供的存款证明材料十分有限，为慎重起见，是不是按规定再查询一下储户的其他交易材料。她翻开原始凭证，当查到该储户的开户凭证时，大吃一惊，该储户填写的地址与中年男子提供的地址不符。小陈马上意识到这事可能会有蹊跷，会不会是粗心的储户当时填写地址一栏的时候填错了？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不同人？她不停地猜测着，同时决定不办理挂失手

续，并耐心向中年男子作了说明。

次日，中年男子嘟囔着来到行长办公室，他似乎认定这笔钱就是他妻子的，执意要求行长同意其办理挂失手续。行长对此事十分重视，认定这事若处理不当，极易引起存款纠纷。从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出发，他果断决定，请法律公证部门依法协助调查并予以公证。

按照开户凭条上的地址，公证员在分理处主任的陪同下，赶了几十里崎岖泥泞的乡间小路，先后走访四个村庄，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同姓的林某。这位林某向公证员详细叙述了存款开户日期、金额及前前后后的存款情况，并向公证员出具了盖有中行古市分理处业务公章的活期存折。经过分理处主任的仔细辨认及在场公证员的公证，最终确认这位林某才是真正的存款人。至此，这起由同名同姓引起的存款挂失疑案，在法律公证的协助下，彻底查清。而此时中年男子的疑虑也已烟消云散，他非但没有因为得不到这笔存款而埋怨，反被中行员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而打动。

第一节 秩序——人类的共同需要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第三思潮的创始人马斯洛在研究人的心理时发现，人类有一种本能的需要，这就是安全。它包括人的身体、财产不受侵害、意外事件的防止等等。儿童心理学家发现，儿童需要一个可以预料的世界，儿童喜欢公平、统一及有一定的规律，缺乏这些因素，他们会变得焦虑不安。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也就是信息时代。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经济发达国家，继而蔓

延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发生的，并且虽然这种变化在中国发生较晚，但速度之快，足以让其他国家“汗颜”。这些变化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个人主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共同的价值观的破坏和道德的沦丧。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描述的，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

但事情也并不是完全悲观的。也正如该书中阐述的，从本性上讲，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大部分基本驱力和本能导致他们创造出道德法则，而这些道德法则又使他们自己结为团体。从本性上讲，人也是有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理性容许他们创造出自发地与他人相互合作的方式。宗教对此进程常常多有助益，但宗教并非社会秩序的必备条件。人的自然状态并不像托马斯·霍布斯所想像得那样一场“人人为敌”的战争，而是一个由许多道德法则所规范的有秩序的文明社会。这已被近来在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运用生物学知识对心理学和人类学进行的研究所证实。

一种思想认为，社会秩序必须是从一种中央集权的、理性的官僚政治的等级制度产生出来。但实际上，秩序的产生并不是森严的政治或宗教方面的权威所委托的自上而下的委任统治权所带来的结果，而是权力分散的个体自行组合的结果。

社会秩序实际上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这与大部分人对社会秩序的看法相左。大部分人认为社会秩序是有人强加于社会的，作为现代政治思潮的鼻祖的托马斯·霍布斯坚持认为人类最初所处的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场战争，要避免这种无法无天的混

乱局面，就需要利维坦式的强大的集权主义政体来实施秩序。

怎样才能自发地并以非集权制方式产生秩序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但价值观和规范之共享并不能产生社会资本，产生社会资本的社会规范必须在实质上包括讲真话、尽义务以及互惠互利这样的美德）？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是 20 世纪末期知识界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走在前列的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而市场本身就提供了自发产生秩序的绝好例证。但秩序可以自发产生这一概念并非经济学家所独有。自达尔文以来的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生物界呈现出高度秩序，并非是由上帝或某位别的造物主所创造的，而是由比较简单的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正如《有线网》（Wired）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ey）所指出的那样，蜜蜂所表现出的行为很复杂，但它们并不是由蜂王或其他任何蜜蜂所控制，而是由单个蜜蜂按照相对简单的行为规则产生出来的（如飞往有花蜜的地方，避免碰上障碍物，不和其他蜜蜂分开等）。非洲白蚁种类繁多，他们筑起的蚁冢非常复杂，其高度超过人的身高，而且里面还有自己的取暖和空气调节系统，但那不是由人设计的，更不是由建筑蚁冢的那些神经系统比较简单的生灵事先设计好的。凡此种种，足见在整个自然界，秩序是进化和自然选择这一盲目和非理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参见该书第 185 ~ 187 页）。

我们说秩序可以自发产生，秩序是人类的天然需要，并不是说秩序不需要任何修正，更不是说人类社会完全靠天然的秩序维持，我们通过描述秩序的产生无非是要表明，从总的方面来看，秩序并不是哪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强加给另一些人或另一部分人的，秩序是人类的共同需要，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虽然有的秩序并不合理，有的秩序是某些人强加给别人的，并不反映人类的共

同利益和要求，但秩序是人类共同需要的，社会规范正是秩序的核心内容，法律则是条文化、强制化的社会规范。

第二节 法治与德治：法律的有限性

一、法制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让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1. 假币收缴纷争不断（柴国建 罗尔豪）

近日，上海一兼职律师在单位领取工资后，来到南车站路邮电支局下属的一邮电所缴付当月 534.90 元的移动电话费。当时他递给营业员五张百元面额的钱款，营业员收讫后称其中有一张系假币，并让另一位同事给开具了一张盖有“南车站路邮电支局没收假币专用章”的“假票变造币没收证”，并将假币没收。该律师对此行为提出质疑，并诉至法院。无独有偶，河南开封一市民郭某到一家商店买东西，在他将三张面值百元的人民币交到收款处后，收款员在验钞机上检验后，发现其中一张为“假币”（实为破损真币），收款员按照商场告示“假币一律没收”的规定，将“假币”没收。郭某对此不服，遂起诉至法院。

近年来，由于假币收缴而引起的纠纷越来越多，这两起假币没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在假币收缴过程中缘何纠纷不断，银行作为假币收缴的执法单位为何屡屡败诉呢？

法规制度不健全是造成假币收缴纠纷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就收缴假币来说，金融部门缺乏一套相应的操作程序来规范其行为。当消费者在交易中不知自己使用的钱币是假币而被没收时，实施没收这一行为的单位或部门在操作中应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和规定，其中包括：收银员的操作始终在消费者的视线内，

双方共同确认，以及没收假币须有严格的经办、复核等手续。而目前，各地收银部门在收缴假币时随意性很大，没收了就算完事。在第一批案例中，就发生了营业员拒绝顾客复看，又走入内室，脱离顾客的视线，以及没收单据不按正规填写等问题，侵犯了顾客的合法权益。

金融宣传不到位，金融知识不普及是造成假币收缴纠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对于假币收缴机关的范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除金融部门、公安执法机关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没收假人民币，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假人民币有举报权。目前，一些商业服务机构大都贴有“假币一律没收”的告示，这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在老百姓的眼中，却仍被认为是执法机关在行使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即使一些很简单的金融常识在老百姓眼中仍是一片空白。在第二批假币收缴案中，商场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其败诉也是必然的。此外，一些收银员服务态度恶劣，职业道德低下，明知是假币却仍退回给熟客户，对所谓的假币既不盖章，也不给收据等做法，也是造成假币收缴纠纷不断的原因。

金融部门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是尽快出台假币收缴实施办法，明确操作程序。二是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三是加大对假币收缴方面的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尤其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要区别清楚，如对“假币一律没收”的告示四处乱贴的问题，应该使群众知道假币并不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没收的，只有金融和公安执法机关才有没收假币的权利（《法制日报》2001年1月10日）。

2. 妻子的钱被丈夫悄悄取走之后

投诉信（节选）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我叫杨江，是唐山市歌舞团演员。

在张××（唐山市歌舞团演员，我丈夫，现家中正闹纠纷）提供不出存单、存款日期、存款额、存款密码和存款尚未到期的情况下，仅凭一张尚未生效的我的居民身份征，从你行电脑查询、支取我在你行存款 35000 元……

我要求你行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1997 年 9 月 16 日

密码锁不住亲属关系

投诉人杨江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近年来，杨江将几万元钱存进了住所附近的几家银行。这件事一直瞒着丈夫张××，因为双方感情上有了隔阂，离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杨江在存款时预留了密码，并且把存单放在自己身上妥善保管。更何况，取款时所需的一份极为重要的证据——居民身份证，必须随身携带，不能不说是万无一失了。

1997 年 9 月间，杨江从外地演出回来，得知在交通银行唐山分行所存的 35000 元及其利息，已被丈夫张××全部取走，不仅大为震惊。同时，也大为困惑。银行的金库可谓固若金汤，那些钱又是如何轻飘飘地“飞”进张××的口袋里呢？

通过了解杨江得知，张××知道她有存款，但搞不清楚存在他们住所附近的哪几家银行，于是采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地毯式清查。住所附近的几家银行全被光顾，虽遭到了绝大多数银行的严辞拒绝，但还是有两家银行很讲情面，在仅仅知道“杨江”二字的情况下，用电脑查询了存在其名下的几笔，由张××填单后取走。

张××在银行称“急需用钱忘了密码”，又因他是储户杨江之夫，银行“急人所急”，就做了好事。恰好银行有个工作人员认识他们两口子，证明其夫妻关系。至于杨江的身份证，1997 年 8 月之前，公安机关为杨江换发身份证，新的身份证签发日期为 1997 年 12 月 31 日。也就是说：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起开始生效使用。对这张未曾生效的证件，她自认拿着也没有用处便随

手放在了家中；不想成为张××向银行提交的“有效证件”。

至此，杨江立即与这两家银行进行交涉。其中的一家与杨江签订了一纸协议，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然而交通银行唐山分行则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误，一场官司也就在酝酿之中。

杨江被驳回上诉

在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1998）北民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1997年8月19日原告（杨江）丈夫张××拿着双方身份证户口本到被告（交通银行唐山分行——作者注）处称急需用钱，杨江本人未在唐山，要求提取杨江户名存款三万五千元，被告在查对无误的情况下为张××办理了挂失手续，由张××填写了‘交通银行单折、印密挂失申请书’。8月26日在办理密码挂失手续的同时将三万五千元存款本金及利息五千四百六十四元零八分全部取出。”

通过法庭审查各种证据，未能看出有张知晓两笔密码的字样。所提及的“查对无误”，是指对证件的查对，还是对张××能够提供“账号、存款金额，储蓄种类”方面的查对？

那么，法庭又是如何认定及判决的？

“本院认为：原告杨江在被告处储蓄的存款是真实合法的。原告与张××现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一个经济实体，张××私自将原告名下的共同存款提前支取，致使利息损失是原告之夫张××的行为所造成的，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理据不充分，不能予以支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杨江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作出（1998）唐民终字751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进一步认为：“杨江之夫张××代为杨江办理了挂失，并提前支取了

杨江户名下全部存款及利息，是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终审判决书认定的夫妻代为办理挂失、取走存款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理论，杨江反驳道：“我在交通银行唐山分行存入现金拿到存单，即与银行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法律关系，预留密码是我与银行之间债权债务合同中的特殊约定条件。银行在没有征得我同意时，或者看到我亲自签发的委托书时，擅自挂失我的密码，就是单方违反约定的行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至于“代理”一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中有代理的规定，但是没有夫妻之间强行为对方代理的条文规定。

会柳暗花明吗？

就在杨江继续投诉的时候，她收集到一份文件：1996年11月15日，交通银行制定的“关于印发《办理储蓄单折挂失等业务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文件号是“交银发（1996）360号”。其中，在谈到“密码遗忘，更换、补留、取消等的规定”时，明确列有“存款人密码遗忘、更换、补留、取消应持本人身份证证明和原存单（折）办理，但不得委托他人办理。”

这份文件对交通银行的下属分行是如何要求的：受理正式挂失手续要求储户填写一式三联“交通银行存单折印密挂失申请书”，经过查验身份证明，审核申请书各栏内容填写无误、进行挂失登记、复核等内部一系列的传递手续后，储户在办理正式挂失手续七天后，持“挂失申请书”收执联及原身份证，前来办理提取现金的手续。唐山分行在当日办理挂失的“同时”，就为张××办理了全部本金及利息“取走”的手续。显然与规定相悖。

杨江拿着这份文件规定，到作出生效判决的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再审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书、裁定书，认为确有错误，有新的证据，可以向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这种再审申请有别于老百姓常说的“申诉”。“申诉”可以不受级别、次数的限制，而再审申请则应在判决生效后两年之内，向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或它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并且，根据1999年7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9]21号文件的精神，“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进行再审的案件，当事人依照这个文件，应当交纳诉讼费用。”而过去，则是不收这笔费用的。

1999年10月21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审判庭，对杨江的再审申请“决定立案复查”。

“欠妥”，可以理解吗？

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取得的合法收入，都应算作做夫妻共有财产。其中一方即便采用了隐匿、转移等方法，都不会影响该财产的共有性质。对此观点，杨江并不否认。

但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有何具体的要求，记者拨通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电话。一位法官谈了他的看法：法庭应当审查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但被告不应将储户这个原属公民个人的定义任意扩大其外延。否则，可以“理解”储户的丈夫来支取其妻子的存款的行为，那么岂不是也应该“理解”储户的父母亲要求领取存款作为赡养费用吗？

听到此，记者还想说：这位法官可能还有不好讲的另一个观点：银行是否有权以裁判者的身份，确认夫妻共有财产的归属使用占有问题。而事实上，唐山分行在向交通银行汇报时，已经在无意中牵扯出这个在司法界、金融界都未探索过的课题。银行业内人士对杨江诉银行案也发表了观点。

自然，有不少人认为：唐山分行的做法诚如他们自己所讲：

“做法不妥”，“可以理解”。因为，银行的出发点没有错，不能仅仅由于取款人忘记了或丢失了密码，就使其取不到钱耽误了急用；不过，记者听到一位较高层次的银行管理人员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银行的营业人员，应当严格依法、依照规定办理储蓄支取手续。正因为交通银行在1996年已下发了“交银发[1996]360号规定”，即便像唐山分行所称：但在储户本人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张××做第三笔款挂失，且于当日办理取款手续，使这笔款“搭车出境”，等等一系列做法，与严格把关、制度严密、手续严谨的银行要求不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邱小兵 刘和平《燕赵都市报》2002年2月1日）。

这两个案例反映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没有法可依所造成的纠纷，另一个可以说是虽说有法律规定和银行规章，但或者可以说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可以说是没有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所造成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对于任何其他的人来说可能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可能是茶余饭后聊天的材料，但对于任何一个当事者，可以相信都是精神、物质双损失。

前面通过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探讨说明，秩序是人类的一种必然需要。在现实社会中，秩序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社会规范，一种是法律。社会规范是人类在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中逐步建立和形成的调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是秩序的另一种提法。由于社会规范是自发形成的，因此其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法律则是在国家产生以后所出现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强制性管理措施。法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在阶级社会中的反映，因此也是调节和调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虽然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制定法律条文，但正如古人所说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只有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和愿望的法律制度才能存在和延续下去，那些只符

合和体现个别统治者利益的法律会与这些统治者一样很快被人们唾弃。

具体来讲，法律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指引作用。法律是通过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责任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调整就是指引。

指引作用的发挥要以对法律要求的知晓为前提。因此，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开展广泛深入地宣传是非常必要的。要紧可能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懂法。

2. 评价作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具有判断、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理的作用。而且，由于法律是建立在社会规范和理性的基础上的，所以也能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善良的、正确的，还是邪恶的、错误的，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通过这种评价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是非观念，从而达到指引人们行为的效果。

3. 教育作用。法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的价值观念一种体现，因此，通过把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凝结为固定的行为模式和法律符号而向人们灌输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之渗透于或内化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指导人们的行为。

4. 强制作用。法律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施的强制性，即对人们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通过制裁体现和加强法的权威性，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增加社会活动的预期性，增强人们的安全感。

正是由于以上作用，法律成为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从总体来看，法律是大多数人利益的体现，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养成自觉学法、守法、执法的习惯。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制裁，更重要的是保护。依照

法律和规定办事，不仅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也符合当事者自己的利益，而不依法律和规定办事，破坏的不仅仅是别人的利益，自己最终也会受到惩罚。

但是也应看到，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在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和效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其作用范围来看，现代社会法律的作用已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但是即便如此，也有其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比如涉及人们的思想、认识、信仰或一般私人生活的方面，用法律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社会经济、生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法律又是相对稳定的，法律的修订一般总是落后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这就造成法律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情况。

从作用方式来看，法律只是众多的人际关系的调整方式之一，而且是属于强制性的方式。而强制性的调节方式并不总是有效的。

从实施法律所需要的人员条件、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来看，如果缺乏具有良好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法律专业人员，再好的法律也是难以切实贯彻实行的。

二、违规违法：警惕第一步

《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所谓意念诚实，就是说不要欺骗自己。如同厌恶恶臭的气味一样厌恶邪恶，就像喜欢美色那样喜爱善良，这样才能心安理得。所以君子必定在独处时也小心谨慎。那些小人平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见到君子就掩盖其自己做的坏事而装出善良的样子。别人看到他

们，就像看到五脏六腑一样，掩盖又有什么用处。这就叫做内心有什么意念，外表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君子一定要在独处时小心谨慎。曾子说：“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你，大家的手指都在指着你，多么厉害呀！”财富可以使房屋得到修饰，道德可以使身心得到滋润，心胸宽广可以使身心舒畅。所以君子一定要做到意念诚实。

意念诚实，就能时时警惕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用社会规范来约束和提醒自己，就能避免违纪、违规、违法，就能使自己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研究行为规律时我们说明，人的行为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其中的内因就是人们的意念，外因就是人们所处的环境。

在现实中，人们是否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意念，另一个就是环境。意念首先是一种自我约束，而社会规范和法律则是一种社会约束。这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一个人没有违法行为，或者是因为其根本没有违法的念头，或者是犯法的成本太高，不敢违法。其中，摒弃犯法的念头，使投机取巧的念头不能发动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产生了这种念头，就会很难消灭掉，如果条件成熟，就会发展成具体的行为。因此，就像《中国社会报》（2001年11月16日）的一篇文章（赵艾境 杨清林 闵文庆）所说的，要慎微、慎初、慎独。

人生的诱惑可谓多矣！权力地位、金钱美女、安逸享乐、富贵荣华等等。

在这种种诱惑面前，放任自我者，头晕目眩、忘乎所以，“权利名”敢夺，“黄金屋”敢取，“颜如玉”敢沾，以至一步步滑向贪欲之壑而不能自拔；善于把握自我者，见权不争，见钱不贪，见色不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面对极具诱惑的权与利，善与恶、美与丑、守法与犯罪、贪污受贿与洁身自爱、伸手被捉与拒腐不沾，仅在头脑闪念之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要经受各种考验，最为严峻的当数金钱的考验。怎样才能保持清醒头脑，守住思想阵地呢？窃以为，在金钱面前当“慎守”！慎守是拒腐防线，是防腐堤坝，是健体免疫良剂。能“慎守”，就能阵地巩固，壁垒森严，“篱笆扎紧”，正气在身。

慎微。《尚书》上说：“慎在于畏小”“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

纵观生活之浪，对于党纪国法有人敢明知故犯，都不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勇气”，而是在泥潭中“练就”出来的。贪污“数额特别巨大”走上断头台的，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由少到多的量变到质变过程；受贿送命的，都是从收受一条香烟、二瓶名酒、一件衣服等等不足挂齿之物开始，而欲垒难填。

德国谚语说“酒杯比大海淹死的人多”，颇有深意。

慎初。客观世界存在着某些隐患、某种危险，而这隐患、危险又往往是潜伏着的，不易察觉，极易忽略，恰如溃堤的蚁穴、焚屋的火种、未爆的炸弹、诱人的毒品一般，一旦发作起来，其后果不堪设想。祸心只要纵容和娇惯它一次半次，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翻船。许多犯事的人是从这条道上走去的。纵观一些贪心的人，有的明知贪心的后果，但还是铤而走险，开始胆战心惊，一旦得手，便胆子越来越大；有的人天真地认为自己作案无人知晓，然而可曾想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名出纳员，一次将公款百元据为己有，几个晚上担惊受怕睡不好觉，可过了一些日子发现“没事”，就手痒了，便干了第二次，接着第三次、第四次，最后贪污几十万元，自己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慎独。“自我保护”贵在自觉，重在自律。守住明火执仗的不敢也许容易些，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一旦犯事，即成过街之鼠。难的是守住鬼鬼崇崇、偷偷摸摸的不敢。因为那时

独立主张，无人监督，细微末节的坏事都能慎守，就足见其觉悟和功夫了。现实生活中，那些“阴阳”两面人，总想在“没人看见”之时偷偷地捞上一把，自以为“天知地知我知”，殊不知，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若不然，古往今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贪官，个个都是铁证。

两千年前中国的哲人老子揭示了“胜人者智，自胜者强”的人生哲理。人要矢志不移，“自胜”以至把握到“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境界当然是不容易的，由于人生的漫长要想一点错误不犯也不可能，但只要耳畔警钟长鸣，慎守自我，大的人生悲剧应当是可以避免的。

三、道德：人生的最后防线

“法治”与“德治”

“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代表徐州形象”。一个时期以来，江苏省徐州市下大决心，用大气力治理软环境，形成了“全民效应”，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广大市民和投资者的欢迎。

软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眼前抓起，从具体入手，从长远计议。徐州市软环境建设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

从大处而言，社会要发展，“法治”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步入了依法治国的轨道。但是，法律规范不是惟一的，更不是万能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同时需要另一只手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经济生活，这就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是一种刚性的规范，是他律；而道德规范则起着一种导向作用，是自律。成熟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也需要道德规范，两者互为依赖，互为支持，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支柱。

治理软环境，需要强化“法治”和“纪律”意识。社会主义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它们以不同的

方式和作用调整人们的行为和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没有“法治”，现代社会复杂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益就得不到保证。同时，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一定的纪律来制约和调整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社会越发展，越需要纪律。

治理软环境，同时需要强化“德治”意识。从一定意义而言，道德规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更普遍、更深远。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对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改善人们的社会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等都起着特殊作用。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加强“德治”，关键要选准切入点，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治理软环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法治”和“德治”并重，才能收到实效（《人民日报》2000年5月8日，作者王华超）。

我们在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行的同时，决不能忽视道德教育。道德是人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日常犯点错误并不可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即改，离圣人不远。如果一个人道德堕落了，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和积极性，对错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情况现在并不鲜见），那么这个人就无可救药了。因此，近年来，江泽民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德治国，这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道德是根，法治是末。法律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产生。

道德是整体，法律是部分。社会规范和道德不可能完全以法

律形式固定下来，换句话说，道德的内容不可能由法律穷尽。

道德是先导，法律是补充。道德是教育，法律首先也是教育，同时又是惩罚，法律只能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人进行惩罚。

从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现在我们正全面实施以德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确立德育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这是教育理念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它标志着我国在教育思想上有一个大突破、大提高、大飞跃，预示着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正在兴起。

我国古代圣人讲“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就是说，做人应以德为本，教育也应以德为本。

德育核心地位的确立，将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教育价值的定位，要定在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上，定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将促使我们必须将教育的视野从智力领域扩展到非智力领域，特别是要从传统的知识、专业、技能教育伸展到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更多地注重学生理想信念、道德人格和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

在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仅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系统观念去分析和看待国际国内大环境。一切彻底的成功都是做人的成功，一切彻底的失败都是做人的失败。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因此，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是做事的基础，人都做不好，难免做坏事。办行以人为本，做人以德为本，要成才，先成人。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能力不足，责任可补。中国历史上强调做君子，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德才兼备才是圣人。

做人就要学会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和客体的关系。现

在的一些人过分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了做人的根本，过分重视功利的东西，而忽略了情感和理想。这不仅给社会带来很大麻烦，也影响了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

人文素质，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养。一定的思想道德观念总是以一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一定的人文意识又总是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人文素质对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基础和文化修养较专业知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人才的质量。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古今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求有新的中国文化精神和理念来推动人的现代化。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动教科书，对青少年将产生博大的精神力量，深刻的道德力量，巨大的感召力量。

人文素质教育是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是如何做人的问题，是基础的基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德育和智育的关系问题，都要由人文社会科学来解决。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认为，自然科学最终只能提供知识，而不能提供智慧。智慧是知识与判断的综合，为了取得智慧，理工科学生必须要有有人文科学的协助。居里夫人逝世时，爱因斯坦的纪念文章没有评述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而是高度赞扬她追求科学真理的高尚品德，认为这种品德要高于具体的科学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需要从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把知识的传授与道德精神的熏陶结合起来，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实现情感与高科技联姻，人文素质与科学精神合璧，获得整体全面发展。

四、西方复兴商业道德

说到道德问题，不客气地讲，当我们正面临着全社会道德沦丧的时候，西方则从历史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复兴商业道德。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3月号文章，题：有德才能服人（记者斯蒂芬·科维）。

我应邀为一家银行诊断员工士气低沉的原因。年轻的银行总裁叹气说：“我真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他精明能干，由底层晋升至现在的高位，却发觉银行业务日渐衰落，生产力和盈利都下降。他归咎于下属工作不力。“我使尽浑身解数激励员工，他们还是无法振奋”。

他说得对。银行里弥漫着疑虑和互不信任的气氛。我与员工多次私下交谈之后，终于明白真相。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已婚的年轻总裁与一名女职员有婚外情。现在事情清楚了：银行业绩差劲是受总裁品德所累。他只顾偷欢，忽略了其行为的后果。

品德是根本，品德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极重要。品德由种种原则和价值观组成，给你的生命赋予方向、意义、内涵。品德构成你的良知，使你明白事理，而非只根据法律或行为守则去判断是非。正直、诚实、勇敢、公正、慷慨等品德，在我们面临重要抉择之时便成了首要。

许多人认为，成功靠天资、活力、人缘。历史却教育我们：长远来看，“真正自我”比“人家眼中的我”来得重要。美国立国的头150年，几乎所有关于成功和自我奋斗的故事，都着眼于当事人的德行。杰出人物像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都明确强调：人生须以品德为本，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和满足。

人类跨入工业时代以来，成功的最大要素从品德渐渐移转为个人的本事。

要成功便须具备魅力、技能、手法，至少在表面上要圆滑通

达。有些对人无害却高深莫测的格言最能阐释这种处世哲学，比如“微笑比皱眉更能赢得朋友”。有些格言显然是教人玩弄手段或骗人，例如：投其所好就可取悦他人。

才能对于获取成就很重要，但并不保证可以让人得到快乐和满足。必须有品德，才可以得到快乐和满足。

推己及人修身不拘年龄，随时可以开始，要诀是知所自省，推己及人。从推己及人的观点而言，须先取得小我的胜利，才有大我的胜利。信守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承诺，即是小我的胜利。

这一类的承诺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我们日常生活时刻要面对的种种抉择。修身的第一步是勇于面对抉择，打定了主意便坚持下去。日复一日，你越来越能信守承诺；你的“品德账户”也就“存款”越来越多。开始时大费气力的事，渐渐就成了习惯。你如果惯于从生活小事修养自己的品德，将来就更有能力塑造应付大事的毅力。

品德修养的基础当以诚信为首要。

人家对你的信任，无论是来自同事或伴侣，都是长年累月经过各种场合积聚而成的。树立诚信之道，其中有一点常为人忽视：对不在场者仍要持忠诚态度。

由家庭做起 修身之道另一要点：勇于认错。看一个人怎样处理错误，往往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行。几年前，我负责找人筹办一个大型会议，选了一个没处理过这种场面的下属委以重任，谁知他竟然坏了大事。事后他对我说：“全是我的错。但如果你再给我机会试试看，我一定会拼命把事情办好。”他勇于承认错误，我决定再给他机会。结果他表现很出色。

修身最好的地方其实是家庭。我们在家庭中更容易流露真性情，而且无所遁形。真纯的品德是家里培养出来的。有人在工作上很能干，对配偶却视如猪狗。

也许以下的情况更为普遍。有一次我在研讨会上说明在家庭

中的修身之道，有个男人站起来说：“我欣赏你的观点。但我和妻子不再像以往那么心灵相通了，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感情。你叫我怎么办？”

我回答他：“你要爱她。”

他感到困惑。“已没有爱的感觉，怎能去爱？”

我说：“老兄，爱是个动词。爱情的感觉来自爱情的培育，你要去爱你的妻子。你爱过她，何不再爱一次？爱是聆听，是体恤，是欣赏。你愿意那么做吗？”

当然，我其实是在问他是否愿意自我检讨，看看自己有没有愈合婚姻品德。夫妻之情在生命之旅中有起有落，因此家庭生活常常试炼个人品德，而且一次又一次地予以弥补。

那名与女职员有染的银行总裁又有什么结果呢？我告诉他我所听说的办公室恋情以及此事对公司下属的影响。他苦恼地抓抓头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跟那女的断了没有？”

他直望着我说：“断了，完全断了。”“那么，第一步就是跟你太太谈谈。”

他告诉了妻子。幸得谅解。他再召集下属开会，谈士气问题。他说：“我已找到问题症结，全是我的错。请各位再给我一次机会。”

过了相当时间，银行员工士气终于回升，银行里又有了坦诚、乐观、信任的气氛（《参考消息》1999年3月19日）。

另据《南方周末》2001年10月4日报道，FTSE4Good指数（道德指数）两个月前正式在伦敦开盘，只有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人的公司才能被有幸被纳入这一指数。它的推出，反映了西方投资者对商业精神的重新理解，或者说，是回归。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层、更多的开放性和更强的透明度的经营理念，是获得股东认可的基本条件。原因很简单，有社会责

任感的领导层不单纯强调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强调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将最终得到一致认可。

然而，重大的商业挑战依然存在。

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确保这种商业道德能够融入到每一位员工的血液之中，并奉行不渝。四年前，壳牌公司决心启动这一可持续发展计划，作为企业文化一部分。

今天，所有这一切开始生根发芽，正帮助我们知道投资决策，并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日常的商业行为。

尽管如此，显然还未到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些规范要最终发挥作用的话，还必须完全融入到每一个员工的日常工作中去。否则，这些规则仅仅是废话。

这就是为什么壳牌公司的基本经营规范实际是一个与决策紧密相连的“作业文件”的原因。理所当然，壳牌的所有公司和所有员工都被要求遵守这些规范。此外，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承包商和商业合作伙伴也能照此规范运作。如果我们不能说服他们这样做，我们将会终止合同或者从合资企业中撤资。去年我们终止了106份合同，并从2家合资企业中撤资。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这违反了要求持续改进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商业规范。

其实，商业道德也是公司和银行赢取顾客的“许可证”。

平心而论，在致力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种突进风潮中，我们几乎很少注意到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的需要和扮演的角色。有句话说：“顾客就是上帝。”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一点——顾客优先权和顾客需要是至高无上的。

满足顾客的需要及将他们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对环境和社会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恰恰相反。在21世纪最成功的企业将是那些通过投资跟上客户新趋势，开发创新性的服务和产品，以及对诸如全球变化等主要的国际问题提供新的解

决方案的企业。这些企业将因此赢得顾客的“许可证”的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漫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再是过去那个企业说什么顾客就认同什么的世界了。今天，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具备识别力，更有质疑精神以及有更多的需求。

在英国和整个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企业能在提供高效、高质、物有所值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扮演解决广泛社会问题的更有建设性的角色。

没有公司能在真空中运行，这一点毋庸置疑。民意测验表明企业已逐步在失去公众信任。公众的褒贬对企业损益表的表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任何认为可持续发展只是正在指示的风潮，或者认为现实世界里财务盈亏才是一切的人，都需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注重道德、社会责任的商业经营意味着有利可图，这种看法现在也正逐步地为伦敦商业界和金融机构所认同。壳牌公司引以自豪的是同时被列入道·琼斯指数和 FTSE4Good 指数。两个月前，新的 FTSE4Good 指数——道德指数在伦敦开始投入使用。FTSE4Good 将有助于公司集中精力实践商业道德，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他们的日常商业行为中去。FTSE4Good 指数现在已经确定了 6 个要素。这些要素要求公司明示经营对社会的影响，声明公司的方针政策以及为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所采取的管理系统等是否注重了可持续发展。

只有复兴商业道德、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帮助我们抓住新商业机会。

在某些人看来，在商业世界中，可持续发展无关紧要。但是壳牌公司的经验是，这是必须强制推行的商业原则，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发展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股东需要。他们相信它将帮助我们抓住新的商业机会。革新和应用新技术可以减少浪费同时生产更多的产品，并且减少环境污染。这些已经应用

到他们的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制品行业，也应用到壳牌公司的一些新行业。

以东南亚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为例。

到 2020 年，整个亚太地区的天然气消费量将会增长四倍。已经形成的主要消费市场有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和印度也将成为主要消费地区。这一地区的需求量将达到每天 6000 万桶，接近现在全世界每天的需求量。

引人关注的是可以防止环境污染的清洁的天然气只占这个地区能量供应的十分之一。这样，在和这一地区的国家政府、生产商和消费者合作的过程中，壳牌公司的新的燃气技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认为技术不仅使壳牌公司开拓了新市场，同时将在解决亚洲环境问题以及节约能源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个例子表明领导层讲求的商业道德远不止是在维护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名声。

当然，发展商业道德并不会一蹴而就。现在，企业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以为发展商业道德、承担更多的开放度和透明度的责任是公共关系部门的事情，或者说是企业领导的事务。

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到董事会以及公司各个层级的雇员。它们还左右着投资决策，比如在哪里投资，进行多大的投资；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使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商业困境，例如公司应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新产品开发和满足顾客需要。换句话说，商业道德关系到（或者说应该关系到）怎样进行你的日常商业活动，并确保这些为高层领导认可的准则能被世界各地的各个层级的所有员工接受。

这是巨大而严峻的挑战，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几份含糊其辞的报告和书面承诺就能解决。

准则和报告固然可以为个人及公司的商业行为提供框架和一套必要的标准，也是信息在公司内外得以贯彻的必要手段，但如

果将它们于实践隔离开来，书面承诺在影响商业性为何促进持久变化的作用将微乎其微。

这说明了壳牌公司四年前开始实施的项目是多么的重要。当时，许多人对他们的诚意和操作能力表示怀疑，它们低估了壳牌和现有的有关商业道德表述的公信力。这些原则最早在 1976 年制定，包括满足顾客的最高要求，尊重人权，维护职工工作条件等。这些原则表明，我们不仅对股东、顾客以及员工负责，还对与我们的业务有关联的公众和社会负责。

壳牌公司努力“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壳牌公司文化一部分”的承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定期公布壳牌在财务、环境和社会方面承诺实现状况的报告、制定新的报告标准以及鼓励公司内部及外部的双边对话等。为此，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责任管理系统。

这最后一点有决定性的作用。持续发展管理框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帮助壳牌公司为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点对于任何人取得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节 充分发挥法律的教化功能

前面我们说明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教育，即通过把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凝结为固定的行为模式和法律符号而向人们灌输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之渗透于或内化在人们的心目中，并借助人们的行为进一步广泛传播。

由于法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交往中反复实践的东西，人们可以不知不觉地与法律认同，被法律同化，形成法律习惯。同时，法律规范的实施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重要的影响。

如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不仅对违法者本人，而且对其他人都会起到教育的作用，而对合法行为的鼓励和保护可以对一般人的行为起到示范和促进作用。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案件，一定要使人们不再诉讼。

北方交通大学法律系教授陈世荣在1999年5月6日的《法制日报》发文指出，除规范和评判处理功能外，法律还有一项时常被人们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功能——教化功能。如果说法律的规范和评判处理功能是以人的行为作为“针对”和“管辖”对象的话，那么，法律的教化功能的发挥，可以使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得以不断完善和提高，从而为人的行为文明以及人本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体现出法律教化功能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思想道德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

以条文的形式存在的、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及其相应后果的规定，是法律的外在和可直观的表层蕴含。此外，法律还有其内在的和非直观的深层蕴含，包括：以本质的意义存在的，转化成为了法律内容的、立法者及其所代表的人们的意志及他们在各个生活领域里的具体的愿望、要求、主张等等，是法律的深层蕴含之一；以规律的意义存在的，体现于法律的内容之中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性的联系和作用的知识，是法律的深层蕴含之二；以价值的意义存在的，融会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之中的，法律本身所固有的公平、正义、秩序、权力、自由等等，是法律的深层蕴含之三；以观念的意义存在的，凝聚于法律的内容之中的并贯穿于立法、执法、守法等全过程的，立法者及其所代表的人们的理想、信仰、道德和价值观等等，是法律的深层蕴含之四。

法律的表层蕴含与深层蕴含之间，各个方面的深层蕴含彼此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共同形

成法律这个生命体的灵魂，亦即法律精神。而这种法律精神，正是法律所具有的教化功能的源泉。

法律问世之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先发生的事情是自身所存储的信息——法律的内容，向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传播，通过人的眼、耳等感官输进人的头脑。此时，法律的内容就不单纯是指法律关于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系列规定，而是包括与这些规定融为一体，并且通过这些规定可以认知、体验和领悟到的法律的精神。因而，法律将其存储信息输进人的头脑的过程，也就是法律“冲击”或影响人的思想的过程。而且，这种“冲击”不是一次性的或转瞬即逝的，而是多次的、反复的、带有恒久性的。因为，不用说一个国家全部的法律，即便是一部部的单行法律，其绝大多数也很“长寿”。在其存活期内，一刻不停地以其存储的信息“冲击”社会上每一个以至每一代人的思想。至于超越时代和国家界限的某些法律原则，对人的思想的“冲击”，更可以持续几百几千年。如“诚实信用”原则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的法律，而直到现今，我国的民法通则还在开列专条予以昭示。

在上述法律信息“冲击”人的思想的过程中，法律的规则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同人的生活经验、心路历程、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等，在相互冲突、争斗、检验和转换时，发生一系列剔除人的贪欲、邪念和残暴；平添人的律己、善良和诚实的“分解”、“化合”反应，使人的思想道德在这种“冲击”之下，得到不断地净化、完善和升华。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律发挥其重要的功能——对人的思想给予教化的功能的过程或路径。

根据上述可以认为，我们的每一部法律，都应该是一部教人如何行为以及明了行为的社会意义的寓意深刻的教科书。而且，一般说来，立法者所属的阶级越先进，法律的精神就会越富于科学性、民主性和合理性；法律自身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从而法律

的教化功能就越强，越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倚重法律的规范和评判处理功能的同时，更应该倚重法律的教化功能，使自己制定的每一部法律，都能够成为引导、塑造、鼓舞和培养人具有优良思想品质和崇高道德情操的好教材。

法律教化功能的急功近利的实现，是使有关主体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之中对他们的义务（或职责）性约束的内容，并依照其要求履行义务（或职责）。尽管这种意义的实现，只是法律教化的起步，但它却至关重要：第一，它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立法者及其代表的人们所惬意的法律秩序，为人们的生存、繁衍和进步创造最基本的社会条件；第二，它有助于促使人们在思想上逐渐树立法律义务（或职责）不可违，否则必受制裁，以及只有令行禁止，依法行为，才能为国家社会和他人所容等等，关于法律义务或法律职责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树立是人的思想道德或精神文明得以不断进步、法律的教化功能得以继续发挥的基本的立足和生长点之一。法律义务和法律职责观念彻底泯灭的人，法律对他也将无以为教。

法律教化功能的渐入佳境的实现，是通过使有关主体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之中赋予他们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各样的权利（或职权）的内容，并通过对他们行使和享受其权利（或职权）的行为给予允许、认可、保护乃至奖励的处理，让他们在思想上自觉地体味、认识到法律不只是约束、限制和制裁，法律还是，而且首先是赋予、鼓励和保护，是他们自身的安全愿望和正当利益要求能够得到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树立并逐步增强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职权意识，对于国家、社会和法律的主体意识，激发、培育他们对于法律的信赖的情感等等，将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或精神文明程度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法律教化功能的理想的实现，是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目标相联系的。它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不

是由于单纯的个人利益需要的满足，更不是由于畏惧因违法而招致制裁，而是由于在思想深处自然而然的、心甘情愿地把法律视为自己和整个社会得以立命安身、繁荣进步的内在根据的一部分，从而认真研读法律文本，真诚地崇敬、信仰法律、主动接收、吸纳、消化法律精神中的规则、意志、规律、知识、价值和理想等各种蕴含，并将其融化于自己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真正成为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自觉、自律、自在、自为的人，把人的以思想道德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文明推向极高的境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所缺乏的正是法律的教化功能的发挥，就是说，法律的教化功能至今还没有发挥出来。

法律教化功能的发挥，首先取决于人们对法律的认知、认识、理解。但是，现在一般人都把法律看做是仅仅作为惩处的手段，尤其是行为不够规范、甚至经常受到约束的人，则更是把法律看成是与其作对的工具。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法律的内涵不了解，认识不到法律对他们的好处。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普法教育，充分发挥法律的教化功能。

第八章 风险观念：按图索骥 风险焉存

引言 经典与案例

《中庸》云：“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读解：《中庸》上说：所以君子安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以等待天命的安排，小人则做冒险的事以求侥幸成功。孔子说：“射箭之道有点像君子做人之道。没有射中靶子，要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

1995年2月23日晚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经过调查确认，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巴林期货公司因操作失误已经破产，于是决定停止其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的交易，所有未平仓合约由该所依法处理。次日，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巴林银行因经营失误而倒闭。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事件的起因：巴林银行集团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总经理兼首席交易员、28岁的尼克·里森在未经授权的

情况下，擅自从事巨额的金融期货交易，结果因投机失败造成约 10 亿美元的亏损。

巴林事件的起源可追溯到 1992 年里森在新加坡初任期货交易员之时。当时，巴林银行有一个账号为“99905”的“错误账号”，专门处理交易过程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差错，如将买入误为卖出等。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差错记录均进入这一账户，并发往伦敦总部。1992 年夏天，伦敦总部的清算负责人乔丹·鲍塞要求里森另行开设一个“错误账户”，以记录小额差错，并自行处理，以省去伦敦的麻烦。由于受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影响，此“错误账户”以代码“88888”为名设立。

数周后，巴林总部换了一套新的电脑系统，重新决定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所有差错记录仍经由“99905”账户向伦敦报告。“88888”差错账户因此搁置不用，但却成为一个真正的错误账户留存在电脑之中。这个被人疏忽的账户后来就成为里森造假的工具。倘若当时能取消这一账户，则巴林银行的历史就可能改写。

1992 年 7 月 17 日，里森手下一名刚加盟巴林的王姓交易员手头出了一笔差错：将客户的 20 口日经指数期货合约的买入委托误为卖出。里森在当晚清算时发现了这笔差错。要矫正这笔差错就需买回 40 口合约，按当日收盘价计算，损失为 2 亿英镑，并应报告巴林总部。但在种种考虑之下，里森决定利用错误账户“88888”承接了 40 口卖出合约，以使账面平衡。由此，一笔代理业务便衍生出了一笔自营业务，并形成了空头敞口头寸。数天以后，日经指数上升了 200 点，这笔空头头寸的损失也由 2 万英镑增至 6 万英镑。里森当时的年薪还不足 5 万英镑，且先前已有瞒上不报的违规之举，因而他更不敢向总部报告了。

此后，里森便一发而不可收，频频利用“88888”账户吸收下属的交易差错。仅在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账户就吸收了

30 次差错。为了应付每月底巴林总部的账户审查，里森就将自己的佣金收入转入账户，以弥补亏损。由于这些亏损的数额不大，结果倒也相安无事。

1993 年 1 月，里森手下有一名交易员出现了两笔大额差错：一笔是客户的 420 口合约没有卖出，另一笔是 100 口合约的卖出指令误为买入。里森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决定，用“88888”账户保留了敞口头寸。由于这些敞口头寸的数额越积越多，随着行情出现不利的波动，亏损数额也日趋增长至 600 万英镑，以致无法用个人收入予以填平。在这种情况下，里森被迫尝试以自营收入来弥补亏损。幸运的是，到 1993 年 7 月，“88888”账户居然由于自营获利而转亏为盈。如果里森就此打住，巴林银行的倒闭噩运也许又一次得以幸免。然而这一次的成功却从反面为他继续利用“88888”账户吸收差错增添了信心。

1993 年 7 月，里森接到了一笔买入 6000 口期权的委托业务，但由于价格过低而无法成交。为了做成这笔业务，里森又按惯例用“88888”账户卖出部分期权。后来，他又用该账户继续吸收其他差错。结果，随着行情的不利变化，里森再一次陷入了巨额亏损的境地。到 1994 年时，亏损额已由 2000 万、3000 万英镑一直增加到 7 月份的 5000 万英镑。为了应付查账的需要，里森假造了花旗银行有 5000 万英镑的存款。其间，巴林总部虽曾派人花了 1 个月的时间调查里森的账目，但却无人去核实花旗银行是否真有这样一笔存款。

据报载，在 1995 年 1 月份的第一周，里森持有的日经股价指数期货合约还只有 3024 份，但在后来短短的 20 天里，持仓量就激增至 16852 份，增幅高达 4 倍。到 2 月中旬，里森的持仓量已突破 20000 份，比在同一市场操作的第二大交易商的持仓量多出 8 倍。事后，英国财政大臣克拉克说，巴林银行的交易报告可能被人篡改和伪造了，以致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现存在的危险。

事实上，从 1993 年开始，里森就以各种理由要求巴林总部不断提供资金，以满足“88888”账户上因持仓量持续增加而支付追加保证金的需要。到 1994 年时，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和日本的金融市场上投入的资金已超过 11000 万英镑，突破了英格兰银行关于银行的海外投资总额不得高于 25% 的限制。为此，巴林总部曾与英格兰银行多次商谈，据称得到英格兰银行主管商业银行监管的高级官员之“默许”。到 1995 年 1 月，里森已要求巴林总部每天汇入 1000 多万英镑。里森后来在狱中发出感慨：“对于没有人来制止我的这件事，我觉得难以置信。伦敦的人应该知道我的数字都是假造的……这些人都应该知道我每天向伦敦总部要求的现金是不对的，但他们却仍旧支付这些钱。”

1995 年 1 月 18 日，日本神户爆发大地震，日本股市因此暴跌。里森所持的多头头寸遭受重创。为了反败为胜，他继续从伦敦调入巨资，增加持仓，即大量买进日经股价指数期货，沽空日本政府债券。到 2 月 10 日，里森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持有 55000 口日经股价指数期货合约。

所有这些交易均进入“88888”账户。为维持数额外负担如此巨大的交易，每天需要三四千万英镑。巴林总部竟然继续接受里森的各种理由，照付不误。2 月中旬，巴林总部转至新加坡 5 亿多英镑，已超过了其 47000 万英镑的股本金。

1995 年 2 月 23 日，日经股价指数收报 17885 点，里森持有的多头合约已达 6 万余口；面对日本政府债券价格的一路上扬，持有的空头合约也多达 26000 口。由此造成的损失则激增至令人咋舌的 86000 万英镑，并决定了巴林银行的最终垮台。

新加坡在 1995 年 10 月 17 日公布的有关调查指出：“巴林银行如果在 1995 年 2 月之前能够及时采取行动，那么他们还有可能避免崩溃。截至 1995 年 1 月底，即使已发生重大损失，这些损失毕竟也只是最终损失的四分之一。”“如果说巴林的最高管

理层直到破产之前仍然对‘88888’账户一无所知，我们只能说他们一直在逃避现实。”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下设稽核与审查部负责对会员的例常稽核，检查交易所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得到遵守。

1993年，稽核与审查部曾对会员进行调查，内容包括：①最低财务要求。②客户基金区分。③客户的保证金。④风险披露文件。⑤合约确认通知书。⑥时间戳记。在这次调查中，新加坡巴林期现货公司因违反多项规定而被罚款23000新元。

稽核与审查部的评价指标之一是流动性头寸。流动性头寸是指会员所持有的可动用资金与其自身及其客户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因行情变动而引起的潜在亏损总和的比率。如果该比率小于200%，则表明流动性头寸指标发现早期警报。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在1994年12月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进行流动性评估时，该指标便发现早期警报。为此，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作出了流动性绝无问题的保证，并提交了1994年12月28日当天财务状况的报告，显示其拥有足够的资金以满足任何交易日的资金差额支付需要。

1995年1月27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致函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指出其1994年12月30日所持有的合约头寸发生亏损的可能性，及其在应付亏损方面的资金局限性。稍后，在1995年2月8日举行的稽核与审查部与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会议上交易所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巴林公司的豪司和琼司则再次作出财务保证。2天后，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向交易所递交了由豪司拟稿，并经巴林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复函。信函继续作出了大量的财务保证，其中包括整个巴林银行的全部资金都可以用来满足其支付需要。事实上，直到倒闭之前，巴林银行也确实一直都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当时十分信赖这些保证。

1994 年的检查发现，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违反了 5 项交易所的条例和期货交易规则，包括客户基金的区分不当，以不合理的方法计算客户基金以满足财务需要等。为此，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于 1995 年 1 月 16 日将检查结果通知了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并要求作出书面答复。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解释是，违规原因主要是记录上的疏忽。后因巴林银行宣布倒闭，故未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结算员在里森的指令下，以填报虚假会计账目的方法使“88888”账户的每月结存余额一般都非常小。因而该账户的情况没有引起交易所的注意。但从 1994 年末开始，该账户的交易金额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为此，交易所于 1994 年 12 月 28 日要求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递交一份显示“88888”账户以“标准投资组合风险分析”方法确定保证金额情况的报告。交易所发现，“88888”账户是“99001”账户的分账户，“99001”账户呈报的保证金金额是 2.421 亿美元，而以“标准投资组合风险分析”方式计算的保证金要求应是 3.421 亿美元，两者之间存在 1 亿美元的不符差额。当交易所要求对保证金不足作出解释时，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有关人员回答要等里森从伦敦回来才能搞清楚。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不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于 1995 年 1 月 11 日致函琼司，强调里森不在就无法解释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反常的。同时指出，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保证金不足可能构成违规。1995 年 1 月 25 日，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在信中作出答复：①1 亿美元的差额，部分由日本巴林证券公司（BSJ）的“92000”账户中的多余资金提供。②巴林银行亚洲区域的保证金要求是通过内部公司间的贷款满足的。③巴林银行计划委任杨（Yong）女士为区域风险和资金经理，长驻新加坡，具体职责是监控大型风险，以及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的联系。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于2月16日直接通知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如果“99001”账户的保证金是由日本巴林证券公司“99000”账户提供的，那么这笔保证金应该从“92000”转到“99001”账户。第二天，交易所又要求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在其财务状况报告中全面说明“99001”账户的保证金情况。

2月22日和24日，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分别提交了有关账户的保证金报告。交易所发现，该报告计算的必须保留的保证金数额与交易所规定的按“标准投资组合风险分析”方法计算的保证金数额之间存在差异。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试图就此问题与里森联系，但得到的回答是他在泰国度假。交易所又试图与Yong女士联系，结果也未如愿。随后就发生了巴林银行倒闭事件。

第一节 银行传统风险观介绍

一、风险是一种必然

只要你打开任何一本银行管理学的书籍，几乎都会涉及风险管理的内容。而迄今为止的几乎任何涉及银行风险（其实涉及企业风险和其他风险问题的也是如此）的研究都会认为风险是与银行共存亡的。陈忠阳同志在其《金融风险分析与管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一书的开场白就是：“金融体系蕴含着风险，金融体系不可能脱离风险而存在，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属性之一。”

二、风险的来源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所处的风险环境。这种风险

环境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宏观风险环境。

银行是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企业，它的业务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上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下至客户的存贷行为。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已经成为联系一国宏观微观活动的枢纽和反映经济、政治变动趋势的晴雨表。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趋势使银行也与国际经济和政治越来越休戚相关。我们把银行业所处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称为宏观风险环境。它包括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国家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条件、宏观金融管理当局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国际经济环境等风险因素。

2. 微观风险环境。

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银行与证券机构、银行与银行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各银行的业务纷纷向全球迅速拓展，货币市场激烈波动，利率和汇率更加变幻无常。因此商业银行的微观风险环境包括同业竞争、利率、自然环境、银行业务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表外活动和或有负债、银行内部管理不力导致的内部人员或内外勾结的贪污、欺诈、蒙骗等犯罪行为等。

三、风险种类

根据可否保险，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可分为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两类。

(1) 静态风险，又称纯风险 (Pure Risk)，一般产生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基本符合大数定律，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其发生概率，从而进行适当费用下的商业保险。

(2) 动态风险，又称投机风险 (Speculative Risk)，产生于经济环境的改变和各种市场行情的波动，其发生的概率和每次发生的影响力大小都随时间而改变，是商业银行经营中的主要风

险，也是最难把握和控制的风险。

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静态风险只有风险损失，而无风险收益；动态风险则既可能有风险损失，也可能有风险收益。

第二，静态风险一般不可回避，风险承担者不得被动防御，而动态风险的承担与否完全可以由管理者自主决定。

第三，静态风险可预见、可保险，因此静态风险的风险成本容易计量，并且作为银行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如保险费，火灾演习费用等等。而动态风险却不易计算其成本。虽然许多擅长风险管理的大银行在实际管理中都将动态风险对应一定的风险成本，如“银行家信托”（Bankers' Trust）就根据各种风险的程度和特性留存风险基金，这个基金算做银行经营成本之一。但是其计算方法常常缺乏客观理论依据，过于主观武断，不够准确。

第二节 对银行传统风险的分析

按照引起风险的原因的不同，一般认为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政策风险、国家风险、竞争风险、经营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一、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指获得银行信用支持的债务人不能遵守合同按时偿还本息的可能性。

形成信用风险的原因既可以从银行本身去寻找，也可以从借款人的角度分析。从借款人的角度讲，借款人不愿或不能偿还贷款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其品德有问题，一个是其能力有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品德和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实它们只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良好品德的人会处处为他人着想，因而会积极提高自己的能力；无品德的人自私自利、心胸狭窄，自然不会有高的能力。有能力的人一旦丧失了良好的品德，他就开始处处碰壁，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在本文中是把品德和能力作为同义词来用的。比如人们一般认为企业有钱不还或不积极筹款还钱是属于品德问题，而企业如果无钱还账则是属于能力问题。实际上，按照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规定，借款人是不应该有还款的能力问题的。因为，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有一个最高限，不能超过企业资本和资产的一定比例；银行发放的大部分是流动资金贷款，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应用企业的日常经营收入偿还，即使企业的日常收入暂时出现问题，按照企业财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提取足够的呆账准备金，这也足以能够偿还银行贷款。显然，如果企业不能按时偿还贷款，不是其本身故意拖欠不还，就是由于过度负债。而过度负债既反映出企业违反制度规定，也同时反映出企业的品德有问题。

从银行的角度讲，贷款之所以出问题，则或者是由于借款人弄虚作假、蒙骗了银行，或者是由于银行（以及借款人）的管理操作或制度存在漏洞。如果是借款人弄虚作假而银行信贷人员没有审查出来，则又是银行信贷人员的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太低，或是责任心的问题。而责任心的问题既是责任人本身的素质问题，实际上同时又是一个制度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就能让不负责任的人去认真负责，而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则本来想负责任的人也很难负责。管理制度的漏洞则是直接属于制度问题。

二、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风险之一，是指银行所掌握的可用于即时支付的流动资产不足以满足支付需要，从而使银行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性。

虽然流动性风险经常是商业银行破产倒闭的直接原因，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其他各类风险长时间潜藏、积累，最后以流动性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流动性风险的分析必须以各类风险分析为基础。要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也必须从更基本、更深层的方面着手。比如 1984 年春夏之际，作为美国十大银行之一的大陆伊利诺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的一次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大陆伊利诺银行最高管理层就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信贷扩张计划。在该计划下，信贷员有权发放大额贷款，而为了赢得顾客，贷款利率往往又低于其他竞争对手。这样，该银行的贷款总额迅速膨胀，从 1977 年到 1981 年的 5 年间，大陆伊利诺银行的贷款额以每年 19.8% 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其他美国 16 家最大银行的贷款增长率仅为 14.7%。与此同时，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利润率也高于其他竞争银行的平均数。但是，急剧的资产扩张已经包含了潜在的危机。

与其他的大银行不同，大陆伊利诺银行并没有稳定的核心存款来源。其贷款主要由出售短期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吸收欧洲美元和工商企业及金融机构的隔夜存款来支持。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该银行的资金来源很稳定，同时在资金使用时却很不慎重。由于大量地向一些有问题企业发放贷款，大陆伊利诺银行的问题贷款份额越来越大。1982 年，该银行没有按时付息的贷款额（超过期限 90 天还未付息的贷款）占总资产的 4.6%，比其他大银行的该项比率高一倍以上。到 1983 年，该银行的流动性状况进一步恶化，易变负债超过流动资产的数额约占总资产的 53%。在 1984 年的头 3 个月里，大陆伊利诺银行问题贷款总额已达 23 亿美元，而净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8000 万美元。第一季度的银行财务报表出现了亏损。

1984 年 5 月 8 日，当市场上开始流传大陆伊利诺银行将要

倒闭的消息时，其他银行拒绝购买该银行发行的定期存单，原有的存款人也拒绝延期到期的定期存单和欧洲美元。公众对这家银行的未来已经失去信心。5月11日，该银行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借入36亿美元来填补流失存款，以维持必需的流动性。1984年5月17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向公众保证该银行的所有存款户和债权人的利益将能得到完全的保护，并宣布将和其他几家大银行一起向该银行注入资金，而且美联储也会继续借款给该银行。但这类措施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存款还在继续流失，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该银行共损失了150亿美元的存款。1984年7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该银行（该公司当时拥有340亿美元的资产）。

三、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波动使银行的存、贷款和拆借等业务的经营成本和收益受到影响和损失的可能性。

一般认为，影响市场利率变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市场利率的变动。但这也并不能说这些因素是不可把握的。换句话说，能不能把握住这些因素，也即能否准确地预测市场利率的变动，也是预测人员的能力问题。

（一）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

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是以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割作为起点的。他认为利息是贷出资本的资本家从借入资本的资本家那里分割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因此，利息量的多少就取决于利润总额，利息率取决于平均利润率。“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01页）。利息也不可以为零，否则借贷资本家就不会将资本贷出。因此，利息率的变化范围是在零与平均利润率之间。当然，并不排除利息率超出平

均利润率或事实上成为负数的特殊情况。

（二）西方经济学关于利率决定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利率决定的理论全都着眼于利率变动取决于怎样的供求对比。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传统经济学中的利率理论称为实际利率理论。这种理论强调非货币的实际因素在理论决定中的作用。他们所注意的实际因素是生产率和节约。生产率用边际投资倾向表示，节约用边际储蓄倾向表示。投资流量会因利率的提高而减少，储蓄流量会因利率的提高而增加。故投资是利率的递减函数，储蓄是利率的递增函数。而利率的变化则取决于投资流量与储蓄流量的均衡。

和传统的利率理论相反，凯恩斯完全抛弃了实际因素对利率水平的影响。其利率决定理论基本上是货币理论。凯恩斯认为，利率决定于货币供求数量，而货币需求量又基本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如果人们对流动性的偏好强，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就增加，当货币的需求大于货币的供给时，利率上升；反之，人们的流动性偏好转弱时，便有对货币的需求下降，利率下降。因此，利率由流动性偏好曲线与货币供给曲线共同决定。

货币供给曲线 M 由货币当局决定，货币需求曲线 $L = L_1 + L_2$ 是一条由上而下、由左到右的曲线，越向右，越与横轴平行。当货币供给线与货币需求线的平行部分相交时，利率将不再变动，即无论怎样增加货币供给，货币均会被储存起来，不会对利率产生任何影响。这便是凯恩斯利率理论著名的“流动性陷阱”说。

凯恩斯的利率理论在学术界曾引起争论。反对方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罗伯逊与瑞典的俄林。他们提出的“可贷资金论”（Loanable Funds Theory of Interest）一方面反对古典学派对货币因素的忽视，认为仅以储蓄、投资分析利率过于片面，同时也抨击凯恩斯完全否定非货币因素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的观点。

按照可贷资金理论，借贷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均包括两个方面：借贷资金需求来自某期间投资流量和该期间人们希望保有的货币余额；借贷资金供给则来自于同一期间的储蓄流量和该期间货币供给量的变动。用公式表示：有

$$DL = I + \Delta MD$$

$$SL = S + \Delta MS$$

式中，DL 为借贷资金的需求；SL 为借贷资金的供给； ΔMD 为该时期内货币需求的改变量； ΔMS 为该时期内货币供应的改变量。显然，作为借贷资金供给一项内容的货币供给与利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作为借贷资金需求一项内容的货币需求与利率则呈负相关关系。就总体来说，均衡条件为：

$$I + \Delta MD = S + \Delta MS$$

这样，利率的决定便建立在可贷资金供求均衡的基础之上。如果投资与储蓄这一对实际因素的力量对比不变，按照这一理论，则货币供需力量对比的变化即足以改变利率，因此，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货币现象。

可贷资金理论从流量的角度研究借贷资金的供求和利率的决定，可以直接用于金融市场的利率分析。特别是资金流量分析方法及资金流量统计建立之后，用可贷资金理论对利率决定做实证研究和预测分析，有其实用价值。

（三）利率决定的多因素说与利率管制问题

影响利率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上面提及的各种因素外，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等，对利率的变动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一国的经济非常时期或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度中，利率管制也是直接影响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管制利率的基本特征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制定利率或利率变动的界限。由于管制利率具有高度行政干预和法律约束力量，排斥各类经济因素对利率的直接

影响,因此,尽管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实行管制利率,但范围有限,且一俟非常时期结束即行解除管制。相比之下,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主要为管制利率。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①经济贫困和资金严重不足,迫使政府实行管制利率,期望促成经济发展和防止过高的利率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②实行管制利率以抑制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③为配合全面的经济控制,如对贸易、物价、投资、生产、外汇等方面的控制,需要对利率实行管制。④发达的金融市场与数量不多的金融机构容易形成垄断利率及贷款的垄断分配,并发展为利率管制。⑤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中,管制利率是配合实现生产、流通与分配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保证实现计划目标及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

(四) 合理预期观点

合理预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所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经济学中的预期是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预测。在 70 年代以前,宏观经济学中所假设的预期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幼稚预期、外推预期和适应预期,这三种预期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单位在对某一经济变量作出预期时仅仅考虑这一变量的现状和历史,而根本没有考虑其他信息。这显然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总是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的,这些信息不仅包括所有有关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而且包括对于有关经济系统的结构的知识,如对利率和汇率水平所作的预测,就不仅要考虑利率和汇率变化的历史数据,还要考虑到决定利率和汇率水平的整个宏观经济模型。这个经济模型就是与利率或汇率有关的经济系统的结构性信息。因此,合理预期可定义为:在对现有信息进行充分加工的基础上得到的对有关经济变量的预测。简单来说,作为一种行为,合理预期就是利用最好的经济模型进行预测。作为一种结果,合理预期就是可能

取得的最好的预测结果。

按照合理预期的理论，如果经济单位的预期服从合理预期，对经济变量的预测就不会出现系统偏差。尤其是对利率和汇率这两个政策性因素较强的经济变量，由于政府的政策有可识别的规则可循，经济单位就可以正确预期规则所决定的变化。

虽然合理预期学派并没有提出一套具体的预测方法来预测各种经济变量，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相当一些人的质疑，但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方面，利率也好，汇率也好，任何一个经济变量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决定的，如果我们能很好地认识和掌握这些因素，把握每一个因素变化的规律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理想的预测结果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取决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提出这样一种理想的预测方法，从客观上讲这确实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从主观上讲，则或者是一些人被权威吓倒，认为“名人”“专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有何能？或者是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方法。

四、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是指由于货币汇率的波动使银行资产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金本位制崩溃后，西方各国都先后实行纸币流通。虽然有些国家仍对其货币规定有含金量，但实际上都是不兑现纸币，含金量的规定形同虚设。各国实行纸币流通后，经历了浮动汇率到固定汇率再到浮动汇率的汇率制度，但都有着根本一致的汇率决定基础。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由于各国货币发行量脱出了兑换黄金的物质制约，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势必出现变化。汇率作为两国货币间的比价，是由两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只不过在固定汇率制下，各国汇率受到了强制的人为干

预，各国货币当局有义务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汇率的稳定，将汇率的波动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各国货币当局不再承担干预义务，汇率受外汇供求关系的制约更明显化了。但是事实上出于政策的需要，各国当局仍然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影响外汇的供求及价格。因此，这两种汇率制度只有被动干预和主动干预的差别。

显然，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外汇供求状况对汇率变动的制约仅仅是第一层次的，外汇供求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决定因素。

理论上说，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体现着国际收支平衡表所列的各种国际经济交易，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贷方项目构成外汇供给，借方项目构成外汇需求。具体来说，一国外汇供给主要来自于：①本国的商品劳务出口。②外国对本国的单方金融资产转移。③外国居民购买本国的金融资产或对本国进行直接投资。④本国居民出售所持有的国外资产。外汇需求主要来自于：①本国的商品劳务进口。②本国对外国的单方金融资产转移。③本国居民购买外国的金融资产或对外国进行直接投资。④外国居民出售所持有的本国资产。因此，一国国际收支赤字就意味着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不应求，本币供过于求，结果是外汇汇率上升；反之，一国国际收支盈余则意味着外汇供过于求，本币供不应求，结果是外汇汇率下降。

进一步来看，一国的国际收支包括经常账户收支和资本账户收支，前者反映商品市场与他国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后者反映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国内外联系。因此，任何影响国内外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供求状况的因素变动都会反映在汇率的变动上。根据纸币流通条件下几十年，特别是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汇率变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响各国汇率变动的深层因素主要有：

（一）通货膨胀率差异

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比率，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自所代表的价值量决定的。物价是一国货币价值在商品市场的体现，通货膨胀就意味着该国货币代表的价值量的下降。因此，国内外通货膨胀率差异就是决定汇率长期趋势中的主导因素。在国内外商品市场相互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一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就必然反映在经常账户收支上，具体来看，高通货膨胀率会削弱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引起出口的减少，同时提高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造成进口增加。另外，通货膨胀率差异还会通过影响人们对汇率的预期，作用于资本账户收支。如果一国通货膨胀率较高，人们就会预期该国货币的汇率将趋于疲软，由此进行货币替换（Currency Substitution），即把手中持有的该国货币转化为其他货币，造成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现实下跌。总而言之，如果一国通货膨胀高于他国，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趋于贬值；反之，则会趋于升值。

（二）利率差异

价格水平的变动影响着一国的商品流出入，而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其变动则会作用于一国的资金流出入。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于他国提高，就会刺激国外资金流入增加本国资金流出减少，由此改善资本账户收支，提高本国货币的汇价；反之，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相对于他国下降，则会恶化资本账户收支。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大大超过国际贸易额的今日，利率差异对汇率变动的作用比过去更为重要了。

（三）经济增长差异

国内外经济增长率差异对汇率变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①一国经济增长率高，意味着收入上升，由此会造成进口支出的大幅度增长。②一国经济增长率高，往往也意味着生产率提高很快，

由此通过生产成本的降低改善本国产品的竞争地位而有利于增加出口，抑制进口。③经济增长势头好，一国的利润率也往往较高，由此吸引国外资金流入本国，进行直接投资，从而改善资本账户收支。一般来说，高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不利于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的行市，但长期来看，却有力支持着本国的强劲势头。

（四）中央银行干预

如上所述，无论是在固定汇率制下，还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当局或为保持汇率稳定，或有意识地操纵汇率的变动以服务于某种经济政策目的，都会对外汇市场进行直接干预。毋庸置疑，这种通过干预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供求的情况，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汇率的长期走势，但对汇率的短期走向会有一定的影响。各国货币当局在战后通过直接干预抵消了市场供求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将固定汇率制度维持了 25 年之外，这足以说明直接干预的成效。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管理浮动制走上了各国货币当局联合干预（Joint Intervention）的阶段，直接干预成为今日影响汇率的一个更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五）市场预期

市场预期因素是影响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性资金（所谓游资）达到了十分庞大的数字。这些巨额资金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着预期因素的支配。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到处流窜，或为保值，或为攫取高额投机利润。这就常常给外汇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成为各国货币汇率频繁起伏的重要根源。可以说，预期因素是短期内影响汇率变动的最主要因素。只要市场上预期某国货币不久会下跌，那么市场上立即就可能出现抛售该国货币的活动，造成该国货币的市场价格立即下降。

以上所谈到的几种因素是纸币流通条件下影响外汇市场供求及汇率的主要因素。当然，影响汇率变动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如各国的宏观政策等，但这些因素大都是通过以上各种因素来发挥作用的，它们的影响有时相互抵消，有时相互促进。因此，只有对各项因素进行综合全面的考察，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才能对汇率变动的分析作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五、政策性风险

政策性风险是指由于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决策的变动、尤其是政策的不适时宜或失误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从引起政策性风险的原因来看，首先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或政策决定者的失误，因而反映了他们的能力问题。从银行自身来看，银行的经营者、尤其是基层行的经营者是否经常与这些决策者交往，是否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和能力，特别是是否清楚各级主要决策人的性格、特长、弱点等，能否预料到政策的变动及他们的失误，也同样反映了银行经营者的能力。当然，这些决策人的决策依据、决策过程、决策程序是否透明和合理，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一些人把银行贷款发放的失误归罪于行政干预，但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行政干预？银行为什么又要听从这些干预？有些人似乎至今还不清楚。其实这首先是制度使然，同时也是银行经营者的能力问题。这将在下面作详细分析。

六、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是指借款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该国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本息的可能性。显然，借款国的这些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潜在的、长期积累和演变的结果。银行经营者是否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抓住借款国的本质问题，正确地预测其变化的规律性，则反映了银行经营者的能力。

七、竞争风险

竞争风险是金融界激烈的同业竞争造成银行客户流失、质量

下降，银行利差缩小，从而威胁银行安全的可能性。竞争风险显然是银行的能力问题。

八、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引起的风险。我们一般认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是不可避免的，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所经过的各种灾害和事故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然灾害，说是天灾，实是人祸。而一些意外事故也并不完全是意外的，而是平时的疏忽、麻痹大意造成的。

九、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来自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特别是重要管理决策人员的违规经营如越权贷款或交易、做假账所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银行的操作风险并不太大。这是因为各国银行都有一批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不仅为银行的正常盈利和发展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而且为全社会资金的正常流动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站岗放哨。但是也应看到，近年来，由于人们的道德水平滑坡，使银行面临的操作性风险越来越大。前面所举的英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银行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源于一个交易员的违规操作，而下面的《银行职工监守自盗》案例也不过是众多银行业违规操作中的普通一例。

银行职工监守自盗

之一：浙江省某市工行一临时工用空存折 137 个，盗取巨款 290 万元。

2000 年 1 月 17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某市一支行里，一个消息震惊了该行领导：该行下属的新南站储蓄所职工翁 × × 失踪，同时在核算时发现 600 万元巨款在本月 15 日有人存进

137 个某电管站用户的空储蓄卡里，之后又发现 16 日被人将这笔款项中的 289.9 万元从市区 30 多个储蓄所提走。该行随即向公安局紧急报案。

干警们调阅了被盗取款项的市区 30 多个储蓄所电视监控录像资料，发现了许多疑点。1 月 19 日，干警们通过对新南站储蓄所的有关员工调查访问，发现该所临时工周×疑点较大，随即对他进行传唤。20 日晚，周×交待了关闭监控系统盗取款项的经过。

2000 年 1 月初，入行工作才三个多月的临时工周×，由于吸毒需要大笔资金，与该市无业游民何××、叶××合谋作案。

1 月 14 日，何××、叶××通过该市一房屋介绍所，租下一间一楼的房子，并在所租的房子里挖了一个长 2 米、深约 0.7 米、宽约 0.5 米的大洞。

1 月 15 日，周×把同事翁××骗至租房。房内的何××、叶××用尖刀顶着，逼着翁××说出自己的操作卡密码。接着，他们给翁××注射了高剂量的毒品致其昏迷，然后，周×骑车来到新南站储蓄所。

这时候，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已全部下班走了，周×溜进储蓄所，拿出他经手的又尚未被用户取走的 137 个某电管站用电户的空白储蓄卡（卡内均有人民币 1 元），利用翁××的操作密码启动操作系统，往每个储蓄卡里注入 4.6 万~5 万元。一个多小时后，大约 600 万元资金被周×注入进了这 137 个储蓄卡里。

做好这一切后，周×回到了租房，当晚他们把翁××掐死，把尸体放进挖好的洞里，用搅拌的水泥混合土把尸体埋住。

1 月 16 日，叶××、何××分头在市区的 30 多个储蓄所里疯狂提款。由于该储蓄卡提款时无时间、数额限制，他们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提走了 289.9 万元现金。当晚何、叶二人乘火车逃往安徽。而周×次日若无其事地又到储蓄所正常上班。

根据周×的交待，干警们于21日在他们的租房内挖出了109万元现金和数十张储蓄卡，挖出了被害死的翁××的尸体。随后，干警们又逮捕了何××和叶××，案件告破。

之二：以工作之便利用计算机进行诈骗

1997年8月28日，N银行财会部计算机操作员陈某，利用工作之便私刻公章，伪造账户印鉴，窃取并更改开户申请书的账号，涂改票面金额，利用电脑进行无传票记账，并仿制与银行正在使用的同型号的电脑、打印机，采取相同数据盘，诈骗银行资金160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之三，利用职权违规挪用客户资金

1996年5月6日和5月28日，A银行营业部先后收到S公司存款共2000万元自开“特种转账凭证”划给Z证券公司。当会计经办人员在办理此项业务询问原因时，张某声称银行与客户有协议要求这样处理。于是，挪用客户资金的违规行为就在正常的程序中完成了。事隔不久，该存款户资金的违规行为就在正常的程序中完成了。事隔不久，该存款户要求提取存款时，发行账户资金留在了张某的办公室，既没有交接，也没有支行公章，纯属挪用客户资金的个人行为。证券公司所用资金的成本以利息方式付给败露暂将好处费挂在支行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后款项虽被追回，但对银行信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显然，操作风险首先反映出银行的制度问题，同时当然也反映出银行重要管理决策人员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问题。

上述的分析表明，造成银行经营的风险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银行经营者能力问题；另一个是银行的制度问题。而银行制度既是企业制度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整个经济、政治制度的反映。我们一般认为，制度和能力是两个问题，尤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很多人把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归结为制度不合理，表面上看，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

制度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至少是制定制度、设计制度的人的能力问题，制度制定、设计的合理、有效，反映出设计者的能力高超，而制度制定和设计的不合理或无效，则反映出设计者的低劣的能力，就会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一切问题其实都是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当然，制度是否合理，不仅仅反映了制度制定和设计者的能力问题，也反映出执行和贯彻者的能力问题。因为一项决策（制度）是否科学，取决于这项决策是否有明确、合理的目标、高质量的信息基础以及是否具有反馈迅速、调整及时的有效机制等，而这些决定决策是否科学的因素都或多或少与决策的执行者有关。

第三节 中国银行业特有风险分析

一、中国银行业表层风险分析

在目前的条件下，一般认为，中国银行业除了面临上面所说的所有银行都会遇到的风险之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特色的风险。这里，我们把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风险分为两个层次，即表层风险和深层风险。其实，不仅这两个层次的风险是相互关联的，后者是前者的深层原因，而且这些特有风险与上节我们分析的一般风险也是相关联的，“特有风险”是“一般风险”在中国条件下的表现，只不过这种表现过于“典型”，比如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重很高，持续时间很长，且一再反弹，有的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其总资产的 25% 以上，有的则更高。这样的银行不破产，在国外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表层风险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数额大、比例高；二是资本金严重不足，部分金融

机构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缺乏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机制，违规经营和金融犯罪时有发生。

为了分析的方便、清楚，让我们先对这几方面问题作一简单分析和归纳。在这三个方面风险中，应该说第三个即金融机构缺乏对其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是因这些经营管理人员的违规操作、金融犯罪多是直接后果，而第一和第二即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数额大、比例高和资本金严重不足是次终后果（最终后果将可能是金融、经济、社会动荡）。换句话说，正是由于金融机构缺乏对其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才直接造成金融管理人员的违规经营和违法行为，从而造成在银行贷款方面管理不严或不负责任，出现大量的有问题贷款，银行亏损严重。而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对其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则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根本就不知道怎样监督；一种是知道怎样监督而没有监督；第三种是知道怎样监督而不能监督。

关于第一种情况，可以说虽然我们现在有着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制度并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体系，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和设计一些规章制度的，而一些有决策权的人士“整天坐在空调屋子里”，没有或不做调查研究，因此难免就造成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不完善、脱离实际和一些规章制度之间不协调甚至矛盾的问题。应该说，现在这样的问题并不很少。因此，这也就造成我们的一些监管人员不知监管什么、怎样监管的问题。这既是监管人员的能力问题，但也是制度使然。因为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使政策的制定者真正承担自己制定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不能有效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不能实现庸者下、能者上的良性循环，那不负责任的政策、随意决策就会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政策、决策指导下经营所造成的损失就不是风险，而是必然。

关于第二种情况，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人并不积极履行其职责，人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只谋其利，一张报纸一杯茶，放下报纸就扯闲话。这是个责任心的问题，因而也属于制度问题。

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还有第三种，即本来也知道该怎样做，但就是不能那样做。比如在银行贷款中，本来知道这笔贷款不该发放，但由于种种原因又不能不放。这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上级领导的“点贷”，这属于行政干预、政企不分；一是同级之间的“互相帮助”，如你给我贷款、我给你免税，也就是损公肥私，拿国家、人民的钱财、权力通人情；这第二种情况往往又与第三种相联系，这就是亲戚、朋友、老乡等的人情贷款。显然，这也是属于制度问题，当然也包含着人的观念和认识能力问题。

总之，金融机构缺乏对其经营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的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能力太低，二是制度不合理，造成人们不负责任。正如上面所说，制度问题也是属于能力问题，而能力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设计合理，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就能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积极提高自己的能力。而如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就不仅不能指导人们正确行为，还会造成投机、钻营、不负责任等事件发生。那么，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能力和制度问题呢？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也包括集体所有）。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但始终没有解决好企业的性质问题，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虽也在同步改革，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多少，反而似乎越来越严重。而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不是偶然所致，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对此，我们在第七章第四节已作了详细说明。

显然，我们不必抱怨银行的经营者的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时时

或经常会受到行政干预；我们不必抱怨政企不分和行政干预，因为国有企业和银行就是政府的；我们不必抱怨没有经营的自主权，因为这些权利本就是属于所有者的；我们不应抱怨企业的职工和经营者没有能力，因为他们的天职是服从，他们就是为企业的所有者——政府负责的；我们也不应抱怨国有企业不还国有银行的贷款，造成国有银行有问题贷款比例大，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只不过是政府的两个口袋，把钱放在哪儿都一样。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样的体制没有效率，这样的体制缺乏创新，这样的制度不计成本，这样的制度不利于发展。这样的制度本来就具有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特点”，在以“放”为本质内容的改革过程中，“乱”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乱的表现就是没有规矩或不按规矩办事，有权利的不负责任，承担责任的则没有权利，乱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损失，多数人为少数人承担了责任。

二、中国金融业深层风险分析

对于上述的表层风险，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但对于中国金融业存在的一些深层风险，即国有资产的流失及无人负责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来，任何企业都有可能损失，任何企业都有一个资产流失问题，单单一个资产流失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关键是，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资产流失有其特殊性，表现为一是数额巨大。据《经济日报》1995年12月4日的文章，国有资产管理政策法规司司长谢次昌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产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流失也很严重。从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为5000亿元。从最近调查的情况和清产合资的结果看，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于这个数字，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我们从破获的经济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来分析，就不难知道国有资产的流失规模是惊人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国有资产的流失就

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资产的流失，但国有商业银行的有问题贷款比例高是人尽皆知的，这部分资产损失不能不说是国家财产的流失。二是造成损失的人不负责任。这是中国金融业的最大风险，也是一切风险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说，国外的金融机构由于其所有权是私人的，因此，造成的风险损失有明确的个人承担，而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是国家所有的，权责本来就不明确，经常的行政干预为银行经营者的不负责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借口。因此实现了收益被看成是个人的功劳，造成的风险损失则无人承担责任，甚至是有关责任人拍拍屁股走人，易地继续做官，损失则由国家来承担。而由于国家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国家的财产实际上是全体人民的，因此，中国金融业的风险损失只能由全体人民来承担，也就是由全体人民特别是存款者替个别经营失误者承担损失。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国有资产的如此大规模的流失而又无人来承担责任呢？显然，从最根本处讲，就是由于上述的国家所有制，它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搞好经营的积极性和动力；从直接原因讲，则是民营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集团所属的商业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冲击以及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国有银行的依赖和冲击，或者说，就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

上面谢司长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还是狭义的，实际上，此处的国有资产流失应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国有银行财产的流失，一是国有银行人员、特别是能人的流失。本来，如果实行的都是国家所有制，不论是财产的流动还是人员的流动都是在国家所有的单位内进行的，虽然这会造成经营没有活力，但不会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但现在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有国家、集体的，也有私人的、合资的。正如上面所说，国家所有制造成的必然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它似乎要把人变成一部机器或机器的零件，但人毕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因而不可能完全变成一部机

器，虽然他们不会对搞好银行的经营管理、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绞尽脑汁，但会为最大化个人的利益而机关算尽。因而他们会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一旦有机会就会试图用用自己的权力。这就形成了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经济体制的改革、管理权的一定程度的下放正是给了他们这样的“好”机会，特别是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下，私人、合资单位较高的待遇对国有、集体单位的员工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这些私人、合资单位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庸才和混饭吃的人，而是需要业务能力强、能开拓市场和带来利润的人才。这必然造成国有、集体单位人才向私有、合资单位流动。而一些集体单位名义上是集体，实际上是私人挂靠，他们也会向国有单位挖人才。因此造成国有单位的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流失的同时就是财产的流失。一方面，人才流失意味着市场流失，从而造成收益、利润流失；另一方面，流失的人才利用与原来单位的人、财、物的关系，挖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墙脚。同时，一些私营、合资单位会利用其“灵活”的经营机制通过行贿、回扣等各种渠道腐蚀国有、集体单位的人员，甚至一些集体、国有单位也会为了本单位或某些个人的私利，用小钱换大钱，不是公事公办，就是私事公办，变相掠夺、侵吞国有资产。而国有企业和银行的一些经营者也会利用权力不清、职责不明等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乐于为亲戚、朋友及其他关系人“帮忙”。更有甚者，一些政府部门的人员在其位不谋其政，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牟取个人的一点私利，与不法经营者狼狈为奸，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国有资产流失的另一渠道是，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下，一些国有银行的领导者不是与私营企业比效益，与合资单位比利润，而是仅仅比待遇，比工资、比房子、比车子，工资越挣越多，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豪华，国有银行的效益则是越经营越差。公款吃喝、公款私欠、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跳

舞、公款点歌、公款私分、公款换文凭、肥水外流、胡子工程、玩忽职守、金蝉脱壳、公款陪客、产权交易、企业亏损、公款行贿（送礼）、三产侵吞集体财产、个人事公家办等几十种直接、间接方式给国家、人民的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因此，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好原国有企业的问题，反而造成国有单位的领导者不比效益比待遇，不比奉献比收入，从而使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更大的损失风险。

三、加入世贸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

中国是在没有解决好国有企业的问题的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贸易组织是管理全世界贸易的组织，但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贸易组织，它的很多条款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制定的，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一块等待分割的蛋糕——谁加入就会有一份，而是一根很容易卡住咽喉的鱼刺——吞进容易取出难，一旦吞进了，动它就疼，不动它也难受。因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无助于解决制度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原来已经严重的金融风险。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的金融业是以金融自由化为基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日、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金融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放松金融管制，放松利率和外汇控制，允许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允许银行在离岸市场开展外币业务等。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世界贸易组织金融自由化的条件和中国的承诺，中国将在两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取消所有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外资银行可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这意味着外

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将大举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与中国金融机构在同等的条件下开展业务，进行竞争。

（二）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特点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管理先进。外国金融机构已经在成熟的世界金融市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着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效率高。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发达国家的银行，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大银行深知这一点。为了吸引优质客户，他们更会以这一点作为其竞争的手段。

待遇好。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好，劳动力成本高，这是众所周知的。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为了实行“本地化”战略，必然要利用其优厚的福利待遇吸引国内优秀人才。

（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金融风险分析

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中国是在没有解决好制度问题的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就使中国的金融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大举进入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学习和借鉴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反而会使原有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原有的资产流失问题进一步恶化。具体表现为：

储蓄、存款向外资银行转移。过去，我国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吸收存款的规模和范围，吸收境内存款规模不能超过其总资产的40%，存款范围仅限于境外和境内外资企业，所以外资金融机构负债中的国内存款并不占重要地位，从境外借入款项通常占其负债的较大部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这些限制取消，外资银行可吸收的外汇和人民币存款范围

拓宽，外资银行数量也会逐步增加，他们必然会加强对存款的竞争。而外资银行规范的管理、高超的效率与国内银行业不能令人满意的经营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也必然会吸引一部分企业和居民，从而使企业及居民部分存款和储蓄转存到外资银行。从表面看，存款的转移本来是正常的，但如果考虑到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高、资本金严重不足，应付提存的能力弱，就能意识到存款转移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而是国内金融机构最为担心的。

贷款业务竞争激烈，国内银行面临“劣客驱逐良客”的不利形势。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外资银行为发展自己的市场份额，扩充实力，必然要以提供方便、充分的资金支持为手段去争夺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与国内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由于不良贷款少、资金成本低、包袱轻、管理好、效率高，因此开发贷款的能力强，这将为其拓展业务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较差、信用评级低的客户会继续留在国内银行，从而使国内银行出现“劣客驱逐良客”的现象。

人才流失问题。正如上面所说，中国过去的经济、政治体制所造就的用人机制往往是“惟上”，因此，善于投机钻营、阿谀奉承的“何绅”式的人物得势。从现在来看，随着民营银行网点的扩展，已经给国有商业银行的职工以很大的冲击，如果外资银行再进入，外资银行员工的待遇将是数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于原国有银行，这会进一步加剧原来已经存在的与民营银行的攀比效应，使国有银行的“能人”进一步流失。

休息、待遇与国际接轨，服务、效率与国际脱轨。正是由于外资银行较高的福利待遇，使国有银行“能人”进一步流失的同时，剩在国有银行的领导者和职工则首先会寻求在收入和待遇方面与外资银行接轨，而在服务与效率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则很少考虑。这里不妨提供一个实例以作比较。

国有银行：休假比服务先接轨

“五一”期间，北京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宣布倒班歇业。

银行业认为轮休的理由有三。一是自助受理个人金融服务的机构已经得到发展；二是从成本考虑，节假日银行的业务量只是平时的 15% ~ 20%；三是银行一线员工也应该享有与其他劳动者一样的休假权利，是和国际接轨的举措。

据介绍，在节假日英国银行业歇业（专业术语叫银行假日）的现象很普遍。但由于英国支付系统的高度自动化，银行假日并未给消费者带来不便。

而在节假日同样很多的日本各银行争相提高服务质量，会尽量少休息，多安排长假中的营业时间。

记者这几天分别到北京天安门、西单、王府井等地随机采访了部分游客。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这几天他拉了好几位客人，都是拿着卡到处找银行取钱的。很多银行安放的 ATM 机不够使用，造成了排队等候的现象。

家住西公街胡同的孟女士向记者讲述了昨晚家中突然停电后的辛苦，“我一大早就到银行去买电，可走了四五站地，发现附近的银行都不营业，好不容易在安贞桥附近找到一个分理处，不但等候的人多，还要等到 10 点才营业，回到家，冰箱里的东西都化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张秋雷认为，我国的银行面对每年几十天的各类假期，是否考虑到了目前我国现金交易量仍然比较大这样的特殊国情？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先做到“国情接轨”，才能安心地和国际接轨，享受长假期（《文摘报》2002 年 5 月 9 日）。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将大量拥进。外资银行实行的基本上是混业经营，业务种类多，适应面广。而中资银行目前实行的还是分业经营，业务范

围受到限制，竞争自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有人会说这不难，央行发一个文件就改了。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当年之所以实行分业经营，就是因为想变“乱”为“序”，而变“乱”为“序”的前提是变“放”为“控”。分业经营正是为了便于有效控制。因此，分业经营既不是“文件”造成的，也不是政策规定的，而是国家所有制这样的制度造成的。

第四节 按图索骥——走向无风险管理

一、关于“零风险”的争论

世界能不能实现无风险，经济活动、银行管理可不可以实现“零风险”？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争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段“零风险”的观点，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不存在“零风险”的管理。比如法国航空—航天医学研究所认识科学研究部主任勒内·阿马尔贝蒂就认为风险不会完全避免。勒内·阿马尔贝蒂是一名军医，也是风险和人力因素问题著名专家之一。他在同《世界报》记者洛尔·贝洛的谈话中强调指出，化学、核电和运输领域最近几十年来在安全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今后却难以在安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他说，目前已经达到的安全水平是很引人注目的。但是，实际上在所有的部门，最近几年来事故率并没有减少。例如，在空运部门，安全水平同20年前差不多。各个部门的安全水平不一样，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由于现有的技术、经济和人员方面的限制性因素，人们不能走得更远。值得高兴的是，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企业仍保持住了这种较好的安全水平。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世界上除了在几个很

特殊的地区以外，在穷国也出现了这种较好的安全形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自 60 年代以来，在生产机制中的人与机器密切结合的方式上，我们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步。现在，人们面对的是作用极大的技术，但人却仍是领导者、决策者和作出反应者。提高安全水平，这个问题已变得很复杂了。人们采取了许多加强安全的措施，但结果仍只能使安全形势保持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企业不敢说出这一点，因为这样说不能鼓舞士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数安全水平已经很高的大型企业没有力量追求更高的安全水平。其次，是否有某种替代技术？完全的自动化从技术上来看似乎还不成熟，特别是从法律角度来看还不成熟。对于由技术问题造成的灾难性事故，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如果你说应由程序设计者承担责任，那就不会有任何人来设计程序了。最后，自动化是一种社会斗争。彻底的自动化能改善安全形势，但却能严重破坏就业形势。所以，社会限制因素在很长的时期内很可能阻碍彻底的自动化。这就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的平衡工作。

因此应当放弃“零风险”主张（《参考消息》2000 年 8 月 23 日）。

二、“零风险”是可能的

虽然今天很多人认为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认为不仅企业、银行管理实现“零风险”是可能的，整个社会避免风险也是可能的。下面这个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银行如何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而减少和避免风险。

之一：内部控制制度不严，导致巨额损失

德意志银行是一家规模巨大的跨国银行，其机构多达 2500 多个，遍及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范围涉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各类金融业务，资产规模在 1995 年达到 7200 亿元。德意志银行在伦敦有一个全资附属的商人银行机构——Deutsche Morgan Grenfell（简称 DMG），主要负责全集团的投资银行业务，诸

如债券、股票等金融产品的承销、包销、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合并、兼并咨询等。DMG 作为德意志银行的附属机构，一方面要贯彻、执行总行关于风险控制和内部管理的方针、政策，同时又必须考虑自己的业务特点。由于它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而投资银行业务是高收益、高风险的行业，所以其内部控制的重点之一是把市场风险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所采用的手段之一是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评估银行所承受的潜在风险，据此控制银行的敞口头寸（既包括银行的全部头寸，也包括每个交易员的头寸）。

德意志银行是一家享有 AAA 信用等级的银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其内部控制制度应该是相当严密的。但是 1996 年该行在伦敦的商人银行机构 DMG 却出现了很大的漏洞，造成了 7.1 亿美元的潜在亏损，是其信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为什么一家信誉卓著的 AAA 级商业银行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前面我们说过，DMG 的业务活动包括投资基金管理，问题就出在这一业务上。该机构管理着许多投资基金，其中有两个较大的基金是由一位叫彼得·扬的人来负责的。按照英国的有关规定，这两个基金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票的份额不得超过 10%，但这位彼得·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偷偷地购买了大量的北欧中、小企业的未上市股票，明显地超过了规定的标准。为了躲避检查，彼得·扬在卢森堡建立了好几个子公司，然后通过子公司来购买那些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我们知道，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流动性差、风险高，当投资者发现了彼得·扬的违规行为后，纷纷要求向 DMG 赎回股份，导致两个投资基金的价格一时间大幅度下降。德意志银行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得不注资营救，把那些未上市股票从基金手中买过来，造成潜在经济损失 7.1 亿美元。

大量的分析表明，内部控制薄弱是导致上述巨额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薄弱环节表现在：第一，授权不当。作为基金管理

经理的彼得·扬的权力太大，而他的同事和上司对他的违规行为采取了姑息态度。第二，牵制不够。按照内部规定，基金经理在购买未上市公司股票时，应报上司批准，但彼得·扬的上司却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签了字。第三，德意志银行整个集团的基金业务的管理方式没有理顺，总行对伦敦附属机构控制失当。第四，当事人有意钻法律的空子。

之二：完善内控机制，强化监督制约

近年来，中国银行山西省大同分行结合自身特点，从“完善内控机制、强化监督制约、狠抓制度落实”入手，以“自我提高、集中培训、外出参观”的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建立完善“自控、互控、他控”制度为条件，以“事前、事中、事后”三级落实为关键，走出了一条基层行处搞好内控建设的基础。大同分行围绕形势教育、法规教育、业务技能教育三个方面，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素质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们以各个阶段不同特点为中心，进行形势教育；以自我防范为重点，进行法制法规教育；以提高业务操作能力为目的，进行技能素质教育。通过一系列灵活、具体、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该行全体干部员工，特别是中层干部和一线员工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操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1998年山西省中行系统业务技能大赛中，该行由过去的连续三年倒数第一，一跃成为全省第二，取得了建行以来的最好成绩。

完善机制是内控建设的必备条件。根据上级行的要求和内控建设的需要，大同分行逐级建立了由行长为组长的内控建设小组，并由过去单一的职能部门，发展到人事教育、党、政、工、团等部门共同参加的“齐抓共管”的内控体系。内控领导小组以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为前提，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检查落实机制，使内控机制建设做到操作有规定，分工有区别，处分有依据。该行还从1998年6月份开始，按照“自控、互控、他控”

相互制约的原则，详细制定了涉及联行、出纳、密押、电脑、信用卡、重要空白凭证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九个补充规定，以及相应的检查制度和连带处分制度。

制度落实是内控建设的关键。在整个内控建设体系中，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对各项内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大同分行按照事前、事中、事后操作程序所建立起来的内控体系，是基层行处在内控建设过程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前，就是在制度出台以后，首先做好传达学习这一工作，做好学习认识工作，就是按照“自控、互控、他控”的制度体系要求，对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事后，就是对所有内控制度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总结、处理、完善、提高。做到每项制度有落实，每次检查有结果，每次违纪处理有回音，使内控建设不断完善。

内控建设的下断深化，有力地促进了该行各项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几年来，该行逐步扭亏为盈，利润不断增加，并多次被评为省、市两级模范单位。

通过前面的分析说明，既然形成银行风险的原因一是能力，二是制度，而制度问题从最根本上讲也是能力问题，因此，风险问题实际上是人的能力问题，随着人的能力的提高，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这说明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才能完全发挥自己固有的天性；能完全发挥自己的天性，

才能彻底了解人的本性；能彻底了解人的本性，就能彻底了解万物的本性。有了至诚之道，就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要兴盛，一定会出现吉祥的预兆。国家将要灭亡，一定会出现妖孽作怪。表现在卜筮的卦体中和人的仪容举止中。祸福即将到来之前，吉凶一定能预先知道。因此，有了至诚之道就像神明一样。至诚是不间断的，不间断就可以长久延续，长久延续就可以得到验证，得到验证就能更加悠远长久，悠远长久就能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能高大光明。广博深厚，可以承载万物；高大光明，可以覆盖万物；悠远长久，可以成就万物。广博深厚与地相配，高大光明与天相配，悠远长久则像天地一样没有止境，这样，没有表现而自然彰明，没有行动而万物改变，无所作为而获得了成功。

其实，早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日本也有人提出过“零风险”的问题，但近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以及中国的现状都似乎表明，金融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银行经营到底能不能做到无风险，整个人类社会能否做到无风险或者叫零风险，这成为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大家知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告诉我们物质与意识具有同一性，即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物质世界。这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是可以被人类认识和掌握的，也就是说“格物致知”是能够实现的。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在本书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强调人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说明人的问题的核心又是一个观念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首要的也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人的觉悟的提高。俗话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因此提高能力重在改变观念，改变我们过去对问题

的认识方法、分析方法，在这里就是要改变风险不可避免的观念。只有首先认为风险是可以避免的，才会去想方设法避免风险；只有想方设法避免风险，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从而才能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从现实来看，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所遇到的风险确实是在相对减少；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一些看似难以避免的风险如自然灾害风险、矿井进水、瓦斯爆炸、桥梁楼房坍塌，说是天灾，实是人祸。这些风险如果人们稍微认真一点就能避免，而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分析和预防。而另一些风险，只要稍加深入分析，就可以找出原因，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比如现在最根本、似乎又是最难的体制和制度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国有制是不行的，但为什么至今又改不了，就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出发，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并证明共产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这里且不说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公有制形式，而即使正是那种公有制形式，也要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能实行，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行。

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什么呢？一是“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二是所有的人都得到全面发展，“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没有这两个条件，共产主义（公有制）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可见，这样的社会既是没有物质利益差别（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完全统一）的社会，又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自身也要求参加经营管理的社会（必须指出，实现每一个人都参加劳动要有两个条件，外在条件是要有充分的生产资料，内在条

件是人自身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消灭物质利益差别、即实现“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的前提条件。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整个社会的财富不能满足全体人的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就必然会存在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你争我夺就不可避免,私有制就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也是消灭物质利益差别的前提。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能力的发展,人的觉悟的提高,每一个人不再是、也没有必要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为了获取生存的资料而劳动,而是把劳动看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劳动也确实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样的人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建立的,但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机械地搬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所有制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到底是否合理、是否先进,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符合生产力的需要、适合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发展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的超越和落后一样荒谬,一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不存在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或哪一个较好、哪一个较坏的问题。既然在现阶段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么经济中存在一系列不可解决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风险本来是没有的,至少是可以大大降低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存在风险,直接原因是现在的一些制度不合理甚至制度本身就是错误的,造成人的不负责任,而根本原因是人的认识水平太低,也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

三、避免风险中的误区

现在,在企业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独裁,另一种是所谓的集体决策。首先应该承认,不能简单地

哪一种形式好与不好。或者说，独裁并不一定都不好。作为一个组织，其构成人员可能是很多的，人们的思想、看法存在着差异也是正常的，这些差异并不是都能简单统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必要的集中和统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行独裁。

当前，随着经济过程的复杂化，集体决策成为避免失误的一种有效方法被广泛推行。但是，由于制度不合理，这种本来行之有效的决策方法在我们这里变了味。正如周枫林同志所说，“我向来十分敬服‘决定’，没敢想过‘集体决定’会有什么错，更不要说其非法或违法了，但现实却偏偏不作美”。他举例说，辽宁朝阳机床电器厂领导集体决定：由工作人员冒下岗职工之名签订《下岗职工委托管理协议书》，冒领国家发放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证金。这笔本应发放给下岗职工的“救命钱”（厂长徐海峰语），却又被厂领导集体决定这样发放——5位厂领导1.25万元；42名没有下岗的职工8.35万元；131位下岗职工2.3万元，还有55名下岗职工分文不发。宁夏同心县劳动人事局领导集体决定：非法招工、录干、转干140人。广东吴川市国土局领导班子集体决定：任免6名干部，其中提职4人，免职2人。提拔的4名政绩平平的干部，均系局长和副局长的亲属。吉林省四平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以指令性任务向全市机关单位和农村摊派销售香烟，干部、职工、教师、农民苦不堪言。

稍稍留意一下媒体，就发现了这么多或违法或违纪的“领导集体决定”，的确令人震惊！这类“决定”又成了某些领导班子集体违法、集体越权、集体为自己“谋福利”乃至集体作案的依据，更为某些法律知识贫乏、政策水平低下、惯于盲从的下属奉为圣旨执行。造成恶果后，既害了干部，害了群众，害了单位，也害了领导和集体，乃至贻害国家和人民。

现在，我们的某些领导和领导集体，法治意识之淡薄，对法

律、法规的漠视，到了让人无法相信、无法容忍的地步。他们或者惰性成习，压根儿就不熟悉也不学习与本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只是凭经验、想当然作决定、下命令，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者法权倒置，自以为只要他的部门具有某一职能，那么，不管他履行这一职能时是否依法、合法，也都“有权这样做”，因而，明明非法行政却道“合理”，明明违法履职却说“合规”，造成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错误多多；或者藐视法律，以种种“对策”对抗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滥用职权，乱发文件，强制执行，造成上下对抗，关系恶化，局面混乱，矛盾重重……

不仅如此，现在的集体决策变成了以集体决策为名、行逃避责任之实的决策方式。法不责众，反正是集体决定，都举了手，谁不该负责，谁又该负责。特别是一些地方对行政犯罪采取单位处罚制，即对犯法单位进行罚款，其结果是整个单位为个别领导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又是谁也不负责任。

吏治腐败是各种腐败之母。像上面那些合法组织“分娩”违法、违纪的决定，就是吏治腐败的表现，不容小视。这种腐败一旦蔓延开来，将是腐水横流、祸水泛滥！

要避免“领导集体决定”走入误区，一是领导集体要学法、知法、用法，努力避免作出非法、违法、违规、违纪的决定；二是领导集体要自觉接受监督，一旦发现决定与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就要放得下面子，做到有错误必纠，及时予以纠正；三是上级领导要及时发现和纠正下级的各类非法、违法、错误决定；四是下级要善于发现、勇于劝阻和敢于依法抵制上级的非法、违法、犯规、违纪的决定。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健全制度。制度不健全，秩序不规范，就不可能根治这些弊端（《法制日报》2000年2月13日）。

结束语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走向成功 任重道远

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的任务在于塑造人。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的动物。很多人都感觉到跟人打交道太难了，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似乎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证明了这一道理。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养宠物的多了起来。从好的方面讲，这可能是生活富裕的表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反映。就是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问题解决了，但精神生活显得贫乏了，人们在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依赖。但这从人身上太难找到了，因此就转向了宠物。因为一般来讲，宠物不会反咬一口，现实中农夫和普通动物蛇的故事毕竟不多，但农夫和“人蛇”的故事倒是不少。

又有人说，人太简单了。只要你肯付出，没有赢不得人心的。确实，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复杂”源于人心多变，“多变”源于彼此的作用和欲望。而“简单”也同样源于人的欲望。因此，一切问题莫不出于人心。既然如此，儒家才提出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断和逻辑，所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知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中最后一句是说：应该重视的却轻视，应该轻视的反而重视，这样做而想把事情办好，从来也没有过。

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就是说，要想使意念真诚，首要条件是让其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真诚），而要想知道为什么，就要把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真相都穷尽了。这就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两难选择，意不诚，不能穷尽宇宙人生真相；不能把握这种真相和原理，意就不能诚。这可让我们如何是好？

好在圣人万能，提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就是君子用人（而不是用非人如牛等）的办法来治理人，就能使人逐步完全改正错误。尽己之心并推己及人，离中庸之道就不远了。不愿意别人加给自己的，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也即射箭之道有点像君子做人之道。没有射中靶子，要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综合这两句话，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求勿求于人。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地反思、反省：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什么又是我们不想要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反省过程中逐步成长和进步的，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个人若懂得反思的意义，经常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达到随心所欲而又不超出规矩的程度尚需百年，如果一个人至今还不懂得反省自己，要想随心所欲又不超出既定的规矩，恐怕百年也难。

谈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中说，人离开了物质是不能生存的，但如果把心的方面抛开不管而偏重在物质一方面去计较，使“心”与“物”失去了平衡的力量，这样世界就不会安定了。

例如一个人，为了满足它的物质欲望，不惜发动坏念头，去杀人放火、作奸犯科。等人犯了罪之后，国家用法律来惩罚他。这只能治其已然而不能治其未然，只能治其表不能治其本，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因为心的部分（杀盗淫妄等）早已胚胎成块，由内而外，天天在流脓淌水释放毒气（贪嗔痴），毒气发出之后，还会伤及他人。这时如果只在皮肤上擦药膏是不能奏效的，因为病根在心底的最深处。可是科学家从来也没想用因果律解决过，把每个人最初一念的坏念头没有“动”的时候，想法不让它“动”（诸恶莫做），最初一念的善心没有“变”的时候，想法不让它“变”（众善奉行），这是最根本的治疗法。科学家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儒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现在人性不然而了，大都是“率物”而不“率性”，这就成了“率物”之为暴、无道以为教了。世界到了无道以为教的时候，哪能不愈趋下流而混乱呢！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不仅仅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更不是单纯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这可以说提出了一个正确的目标。但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尚需从领导到百姓的全社会的长期的共同的努力。因此，走向成功，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陈德维等编著：《怎样使企业长盛不衰》，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一版。
2. （英）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
3. 史蒂文·I. 戴维斯，王海蒂译：《银行管理秘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0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4.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P. A. Kropotkin 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3 月第一版，1984 年 11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根据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伦敦 1919 年版译出。
5.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6. 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刘榜离、王胜利译：《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7. 金鑫主编：《最新金融业案例分类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Alfred D. Chandler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1962 , p. 235.
9. 邓荣霖、杨文士主编：《管理者手册》。

后 记

本书是集体的劳动成果，这不仅指冯彦明、赵胜英、吴华英、王大力、王建民（按撰写章节顺序排列）这五个人，更重要的是指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别人的成果；同时，在写作过程中，厦门大学在读博士冯文丽女士曾提出非常好的意见，在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群慧博士、经济管理出版社的陈力同志也作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使本书通俗、易读，我们力求用“旧砖”或借用别人的“砖”建“新房子”。我们是否正确理解了古代圣人及其他作者的原意，还要请大家评判指正。不过，总体的思路及基本的观点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因此，书中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当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此外，书中有些观点还不太成熟，比如对利率及汇率风险的衡量、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等，我们将继续探讨。

涉及本书的任何观点及问题，我们都愿意和大家共同研究，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本书作者及分工情况是：冯彦明负责整个过程的策划、组织、及全书修定，并撰写导论、第一、二章及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赵胜英撰写第三章和第五章，吴华英撰写第四章和第六章，王大力撰写第七章，王建民撰写第八章。

2003 年 7 月于石家庄